

潘序伦回忆录

PANXULUN · HUIYILU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潘序伦回忆录

PANXULUN · HUIYILU



潘老在学习

目 录

前言.....	(1)
序.....	(3)

× × ×

一、童年时代.....	(8)
二、走了许多坎坷之路.....	(13)
三、开始走上会计经济专业道路.....	(20)
四、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4)
五、创办私立立信会计学校.....	(30)
六、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	(36)
七、立信同学会.....	(41)
八、涉足会计、经济官场.....	(47)
九、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漫长过程.....	(51)
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取之于会计 用之于会计.....	(55)
十一、发挥晚年“余热”.....	(59)

× × ×

附录

一、潘序伦与立信会计事业.....李文杰	(63)
二、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顾福佑 王成杰	(71)
三、潘序伦先生的专著、译著、论文目录.....	(91)

潘序伦回忆录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通县西定安印刷厂印装

•

787×1092毫米 32开 3.25 印张 65,000 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3,100

统一书号: 4166·733 定价: 0.485元

封面设计：颜 黎

社科新书目 157—272

书 号：4166 · 733

定 价：0.85 元

前 言

我国著名的会计老前辈潘序伦先生最近不幸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他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在1984年《财务与会计》杂志上连载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外会计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日本公认会计士隈井要先生全文翻译成日文，在今年日本会计士协会出版的《会计杂志》上连续刊登，并印成单行本，介绍给日本会计界。特别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的立信校友，潘先生的子弟，纷纷来信联系，希望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现将潘序伦先生的回忆录略加补充，汇编成册，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潘序伦先生的一生，是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就从事会计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在旧社会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办起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包括专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函授学校和各种类型的会计补习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为培养会计人才，发展会计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潘序伦先生和立信同人在办学过程中，采用多样化的办学方式，以严格和实用的原则培训学生，造就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人才，使各类学校由小到大，由普及到提高，不断发展。

他在创办立信会计事业过程中，坚持“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潘序伦先生虽已逝世，他这种创办立信事业的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言 前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1985年12月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1985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年，我们编辑部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政治理论学习。一年来，我们编辑部始终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在首位，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通过理论学习，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办报宗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业务能力提升。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编辑部积极组织编辑人员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和学习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编辑水平。通过业务学习，我们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办好刊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稿件质量提高。一年来，我们编辑部严把稿件质量关，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来稿进行严格筛选和编辑。通过严格把关，我们确保了刊物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好评。

四、版面设计优化。为了提升刊物的视觉效果，我们编辑部对版面设计进行了优化。通过合理布局、突出重点，使版面更加美观大方，增强了刊物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五、发行工作落实。一年来，我们编辑部认真落实发行计划，确保刊物按时送达读者手中。通过加强与发行单位的沟通协作，我们提高了发行效率，扩大了刊物的覆盖面。

六、读者服务周到。我们编辑部始终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积极为读者提供周到服务。通过设立读者信箱、开展读者调查等方式，我们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和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七、社会效益显著。一年来，我们编辑部通过辛勤工作，使刊物在传播知识、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刊物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专业信息，也为推动行业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序

杨 纪 琬

《潘序伦回忆录》在《财务与会计》杂志上发表后，我读了很受感动，很有启发。潘老先生撰写出这么一部很有价值的长篇回忆录时，已是九十二岁高龄，实在难能可贵，说明潘老先生对发展我国会计事业的关心。《潘序伦回忆录》，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无论会计工作者，还是会计教学和理论研究者，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教益。现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决定出版单行本，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

潘老先生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多年，和他休戚与共的是立信会计事业。大家知道，从二十年代直到解放前夕为止，立信会计事业在我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会计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立信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丛书，在我国会计工作、会计教育和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潘老先生为之竭尽全力，艰苦创业，锲而不舍，可真谓达到了呕心沥血的境地。立信会计事业永存中国会计发展史册，潘老先生为发展立信会计事业含辛茹苦所做的贡献，也永远铭记在同行们的心中。

二十年代末成立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其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更作出了它独有的特殊贡献。特别是在开拓业务、发掘人才、改良会计、恪守信誉等等方面，都

作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从1927年建所到1935年这短短的几年中，就承办了四千六百多个案件。其后更是数以千计的企业、机关、团体，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了数以万计的案件。在抗日时期，以及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还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国内一些重要城市开设了分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事业的兴旺发达，可称当时执业会计师的“黄金时代”。对推动我国执业会计师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为我们今天开展注册会计师业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人才开发的楷模，事务所不仅本身团结了全国不少会计专家、能人，而且通过“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扩大了社会上的会计队伍，不少人从此走上投身会计事业的道路，到后来成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会计事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会计人才的发展，我们今天需要建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十倍、百倍于当年。因而，团结、发掘一大批有志于会计事业的人才，更是刻不容缓；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还是会计改革的先锋，在积极推行新式簿记、改良会计制度设计等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可贵的是由潘老先生亲自拟定提出、并贯彻始终的“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精神，作为办理各项会计事业的信条，不仅在过去赢得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今天也仍然可以为广大会计人员忠诚社会主义会计事业、保持崇高职业道德所借鉴。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让党和人民信得过，努力为四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潘老先生在创办和发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是全力以赴、一心扑在事业上。尽管道路坎

坷、挫折多磨，他总是不馁不退、锲而不舍，迎着困难上，踏着波折行，千方百计把事业办得精益求精，逐步发扬光大。这种热爱会计事业、献身会计事业的事业心，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是年青人学习的。一个人总是应该有一番事业心的，干什么工作无论哪一行，都应该竭尽全力去把它办好。在争取中华民族腾飞、尽早实现四化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潘老先生主持创办的立信会计学校，是立信会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在培养我国会计人才方面是有特殊贡献的。早在1924年潘老先生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归来，就先后担任了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上海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西方新式簿记，以治学严谨而著称。1927年创办了第一个簿记训练班，以后发展成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直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广州、重庆也建立了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多层次的会计人才教育体系。从二十年代开始到解放前这二十年间，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专业人才，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对潘老先生来说，确是桃李满天下。现在在国内外成为会计界知名专家、教授，或在企事业单位担任重要会计工作的，不少在早年都受过立信的会计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潘老先生解放后在经过种种磨难、多方冲击、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四化建设对财会人员的迫切需要，经潘老先生倡议、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重庆、天津立信会计学校也相继恢复，重开立信会计教育事

业，并日益兴旺发达。立信会计教育事业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启迪的宝贵经验是：第一，多渠道培训，多形式办学，广开学路，多出人才。立信会计教育从夜校、晨校到星期日校，从训练班、补习班、速成班到函校、专科学校，一切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多方创造有利条件，便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青年都能有获得不同层次的会计专业知识的学习机会，在短时间内就能培养出大量的有用人才。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全国有近百万会计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要想在短期内使他们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半个世纪以前，潘老先生联系当时的实践，已经做到，而且富有成果，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做到呢？第二，聘任社会名流任教，自编教材讲义，是解决师资、教材匮乏的好办法。立信会计学校教学人员不多，兼职教师倒是不少。都是潘老先生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而聘请来的社会著名学者、专家，如黄炎培、马寅初、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在立信讲过课，因而立信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他们还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先行试讲，不断修订，最后形成一整套切合实用的立信会计教材。这些也都是我们在今天发展会计教育事业中可以仿效的；第三，精打细算、勤俭办校，这是立信建校以来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值得大家学习。吸取立信的这些办学经验，对于发展我们今天的会计教育事业，都是极有意义的。

立信会计丛书在当时的中国会计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立信会计事业增添了光彩。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会计理论发展方面也远远落

后于西方。当时我们这些三十年代的学生，念的书都是美国的。立信会计丛书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水平也较高的会计著作，前后出版了五、六十种之多，发行量也很大。全国各地包括解放区也都流传很广，在发展中国的会计学理论、推动会计工作、培养会计人才等方面，这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1981年在潘老先生的倡议下，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所，编辑出版《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受到会计界和读者的欢迎。潘老先生是会计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是旧中国仅有的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学识渊博，著作颇多，见地很深，特别是在治学、讲学和做学问上，有一股顽强的精神，锲而不舍、坚毅不拔，终于攀登了会计学术上的高峰。特别是潘老先生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是值得赞赏的。解放初期，我们学习引进了苏联的一些会计制度，潘老先生为了推动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年逾半百自学俄文，而且学得非常好，还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一书，向中国会计界介绍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近几年来，潘老先生已年逾九旬，仍关心会计理论的发展，经常撰文谈及自己的看法，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各行，积极倡导会计改革创新，并对会计参与经营管理，会计走向电算化，等等，仍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学习、宣传、探索。

潘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会计界的老前辈，是著名的会计事业家、会计教育家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会计学者。立信会计事业的成功，浇铸了潘老先生的全部心血。潘老先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国会计界的重大损失。出版这本回忆录是对潘老的最好悼念，我写这篇序言，也寄托了我对潘老的哀思。

一、童年时代

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①，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羨（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愜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羨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②，每逢他的生辰（阴历12月29日），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③，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考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

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是我的一个远

① 详见谢灵运、李白、白居易等诗文集、书简。

② 见现存清光绪十七年重建东坡书院碑记。

③ 清朝所规定的臣民大礼服的帽饰。

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①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仍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第一期共招收36人，分正科、预科两班。我当时13岁，被选入正科，据说正科毕业就可以算是“秀才”了。学校规模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设校长、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之外，因学生全部住读，还设有舍监（相当于训导主任）。这些成员，全都是由二十四姓大族论资

① 科举考试的一种正规文体，字数有一定限制，全文一定要分为八个段落，所以称为“八股文”。这种文体，原是明、清两朝要限制知识分子发挥自由思想而进行的一种禁锢方法。

协商推荐的。例如，校长是由一位年已古稀、姓许的“贡生”^①担任，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学监姓崔，也是贡生；舍监则是一个祖上做过高官的姓吕的担任。其教育制度和管理方法，仍保留着许多旧科举私塾的痕迹，教职员可以任意斥骂学生。课程除读四书、五经、史记等古典文学以外，还有英文、日文、数学、中外史地、体操、音乐等，简直可以说与今天的高中的课程差不多了。我因为过去已经看过、读过这些书，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到年终考试得了个第一名。回到家里禀告了父亲，他向来对子女很严厉，面部表情总是冷若冰霜，这次总算对我第一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颅，勉励我继续努力。



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只有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简称“家

^① 是一个比秀才高，比举人低的科场等级。

祠”),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禁止进入孔子庙(尊称圣庙或文庙)。就是在后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合,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自己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亲姓潘,我母亲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现在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学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都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

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因我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后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

下面我将详细谈谈我在求学和就业的道路上所走过的弯路，作为青年同志们的借鉴。

二、走了许多坎坷之路

上一篇我回忆了七十五年前的童年时代。本期我要谈谈我在青年时期由于自己的过错，在求学、就业方面所走过的许多弯路，其中有一段时间，我险些堕入了污泥浊水之中。我这段历程很可以作为现代青年升学、就业的借鉴。因我毕生从事会计事业，因此更希望财会界的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庶免重蹈我的覆辙。

我被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就转入当时的常州府中学堂就读。那时正值辛亥革命，中学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因此我很快就获得了常州府中学堂的毕业证书。当时共和民主国体初创，全国各地都需要法政人才，我为做官的虚荣心所驱使，就考进了南京法政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几位政客筹办的“私立大学”。因它不符合大学条件，不到两年，就被主管部门勒令停办。这样，我就第二次失学了。但不久，我又看到了报纸上刊登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招收无线电收发班学员的广告，其中所列的学员待遇，除了学、膳、宿费全免外，每月还发给每人生活费18块银元，每学期发给冬、夏季军服各一套，待遇可算得上优厚了。当时想，以前家庭为我负担的求学费用已经不少了，倘能考进这所军官学校，倒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而没有考虑电信收发工作对于我是否适合，就贸然投考了。这次投考的学生多达1,300人，结果只录取了21名，我竟得了第一名。这样，我就成了我国第一批学习无线

电专业的学生。

海军军官学校的教师，是由海军部用重金聘请来的挪威人，每天学习的是极简单的电磁知识和练习收发无线电报。毕业考试考了五门科目，我的成绩每科都是100分，总平均当然也是个满分。根据我的学习成绩，按照学校的惯例，把我留校担任助教职务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但学校领导认为我骄傲自满，对于师长礼貌不周，把我派到海军某舰上去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每月饷金不过18块银元，和做学生时的津贴相等。舰上生活既辛苦又单调，待遇又是如此之低，这时我才意识到，象我这样的人在军舰上当个无线电收发报员，实在太不适合了。因此，我就假报疾病，起初是请病假回家休养，后来就呈请退出军籍。可是海军领导已看出我是有意规避，便行文到我原籍宜兴县署，追我回去，否则要我赔偿学校在我身上所花费的学、膳、宿等一切费用，约计二千多块银元。后来，我总算找到那时的吴淞海军医院，恳求医师为我出具了“确有疾病，不适合在海军军舰上服役”的证明，才算了结此案。这是我第一次求学就业的失败。究其根源，无非是因我一时贪图小便宜，以致蹉跎了我青年时代的宝贵光阴。

我第一次的就业失败后，接着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就业，更是毫无意义。那时我姐夫的一位胞兄夏某，他在清朝的官职是“候补道”，当时任南京造币厂厂长之职，我恳求他看在亲戚的份上，为我谋个职业。他觉得不好回绝，就发下一张委任状来，派我在该厂当一名翻译员，月薪30元。其实在造币厂里没有什么翻译工作可做，我当时的英语程度也够不上当翻译员，每月30元只不过是一项干薪。但那时我

还嫌太少，几次恳求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另委他职。果然，他又给我加了一个“邦技士”名义，薪金增加了10元。其实我对造币工艺一无所知，仍是干薪性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事哪会久长？不到两年，我这位姻亲厂长大人就因故去职了，我在该厂任职也就随之告终。

我从造币厂卷起铺盖回到宜兴蜀山家中以后，不久就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职务。在这里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有位宜兴同乡世交周某做了镇江中学校长。我就极力恳求他在该校为我谋个工作。总算没有白求，得到了一个“教习”（即今日所称的教师）的职务。每周任课10小时，月薪40元。不久又承他的情，给我每周增加了两小时的课程，月薪也加到48元，这要算我30岁以前得薪的最高记录了。我所担任的课业，虽然每周只有12小时，但科目有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可谓花色繁多，凡是其它专科教员所不愿担任或不便担任的课程，都交给了我，把我作个尾闾。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样样都能、但没有一样精通的人。学生当然看不起我这样的教师，特别是我任课班的学生，往往对我采取蔑视的举动。于是，我就发愤自修英语，拿了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袖珍字典》，几乎把它读得滚瓜烂熟。但除了死记生字之外，说和写都还不行。

我自谋职业，就这样浮浮沉沉地度过了六个年头。后来，我国进步学生开展了“五四运动”，镇江中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这位守旧派的校长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最后落职而去。我这个教课能力不好的校长同乡，属于校长私人之例，当然只能随着他一同离校。因此，我又失业了。自己没有真实的本领，要想在职业界里混饭吃，实在是太靠不住

了。

后来，我的情况越变越坏。我从镇江中学回来以后，在家乡闲住了半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我竟在乡间结识了一群赌徒，经常出入于乡间赌窟，进行赌博。我的前妻储氏不忍我如此堕落，每次都扯着我的衣襟不让出门，但我总是绝裾夺门而出。眼见我就要向深渊中沉沦，全家人都为我着急。后来，总算来了一个转机，才使我醒悟过来。事情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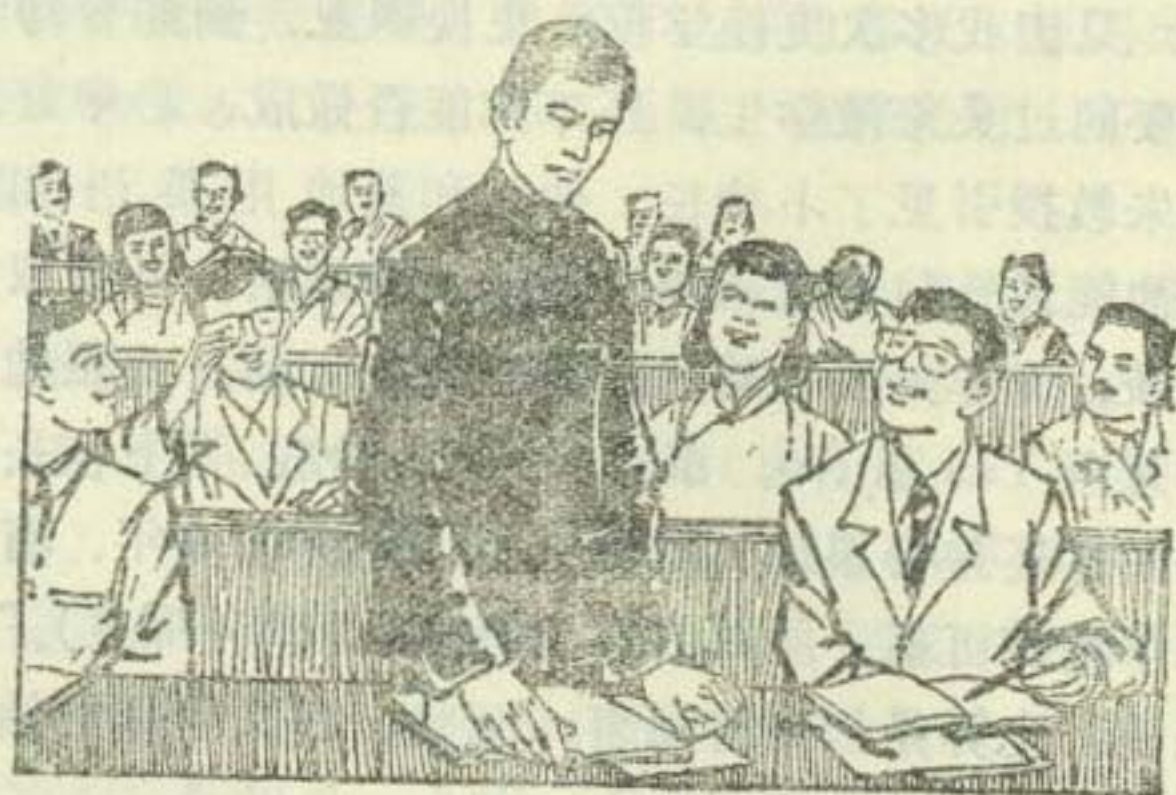
民国八年(1919年)的农历“除夕”，按照本乡习俗，凡是旅居外地的人都要回乡度岁。我听说西邻的小时同学、现在外地任小学教师的周某已回家来了，就顺便过去访问，同他聊天。周君对我说，他任小学教员已经多年了，觉得自己没有学识，前途没有希望，听说近来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人很多，他也想拼凑一些旅费到法国去留学。这寥寥几句话，似雷轰电击般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整夜不能入睡。心想，周君的家境要比我清寒些，年龄也比我大些，天资比我还要差些，他倒有这样的志气，想到国外去留学，象我这样不求长进，浑浑噩噩，虚掷光阴，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大年初一天刚破晓，我就唤醒我的前妻储氏，对她说明情况，请她不要阻止我在新春头三天里仍到外面去玩玩，因为我早和一班赌友约定，不能失信(现在想来，这种信守是多么荒唐)，从大年初四起，我保证不再赌博闲荡，如有机会，要同周君一起出国留学！我二哥听到我这番话，不禁嗤之以鼻，他说：“你还是安份守己在家好好度日罢！我们的祖先还没有这种福份，会生一个出洋留学的子孙。”我当时只

好忍气吞声，强忍着未吭声。

我的家境平常，哪里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呢？况且我的英语程度很低，以前所进的学校又都不合资格。不得已，我就去上海找前在浦东中学任校长的黄炎培老师，请他给我一个入学的指导。黄老师听了我的想法以后说：“你的志愿很好，假如想出洋留学，可先到大同学院去补习英文和数学。”当时我想到在镇江中学担任英语课时，因自己的英语程度低，受到同事和学生的嘲讽，很想到圣约翰大学去补习，因那里的入学考试很困难，因此，就又请求黄老师为我写一封到圣约翰大学去补习的介绍信，并说明哪怕是做一个旁听生也可以。黄老师满足了我的要求，给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朱友渔博士兼牧师写了一封介绍信。朱教授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我说：“潘先生，你想入敝校求学，鄙人是欢迎的，停刻我和你去见卜舫济校长”，我当时听他称我为“先生”，感到很惶愧，因为在旧社会是断乎没有教授称学生为“先生”的。这一声“先生”勾引起我很多的心思。象我这样大的年龄，本该做“先生”了，只因我多次更换学校、更换职业，到如今却一事无成，还要回过头来做学生，还不知能否做成，心中好不辛酸！我由朱教授引见了卜校长，他很和蔼地用英语和我谈话。其实他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其所以用英语和我交谈，无非是要考验我的英语程度如何。我很勉强地应答了他几声 Yes 和 No。事后朱教授告我：“卜校长认为你的程度固然还差得很远，但看到你已任职多年，有了经验，且求学精神可嘉，所以收你为特别生（即旁听生）。”这在圣约翰来说，也算是一件特别事。至此，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在圣约翰大学里，象章程、规则、通告、书信等都是用英文书写；同学间相互交谈也是用英语；教师讲课更不用说，不论中国或外国教师全是用英语。有了这样好的条件，所以我就抓紧了英语学习，从清晨六时起床，到晚上十时宿舍熄灯为止，除了一日三餐以外，都埋头于书本之中。开始，我在班里的英语程度很低，教师都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总不向我提问。有一次朱友渔教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对我提问，本该答“*Yes*”，我却答成“*All right*”，顿时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羞得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但这对我是有益的，促使我更加勤奋地学习，从早到晚埋头于书本。卜校长及主管我课业的经济系主任雷曼（*Remer*）教授，见我学习十分努力，又曾经在南京法政大学和海军军官学校读过几年，就私下对我说，倘若本学期大考各科都能得到70分的成绩，可以让我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这在圣约翰大学来说，确实是首开先例。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终于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便是全班最优二



人中的一个。最后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为全班之冠，并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得了唯一的一块金质奖章，被授予文学士学位。

圣约翰大学，原是美国教会通过在我国办学的方式，对我中华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学校原设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所用课本就是《圣经》。每逢星期日，全体在校学生照例都要到学校专门设置的教堂里去“做礼拜”。但是，这种诱惑兼强迫的手段，并未能使我信仰上帝，因我之所以进入圣约翰大学，完全是为了学好英语。我在圣约翰大学求学中，有两点较深刻的体会：一是要在逆境中善于忍耐。如果我不咬紧牙关，忍受住同学对我的种种刺激，而贸然辍学返乡的话，我将有可能终生堕落下去，沉浮于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二是要有勤学苦读的毅力。如果我不能日以继夜地勤学苦读，我就不会获得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的学位，更不可能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总之，“成功道路多艰难，奋力前趋能过关。”我愿以这两句话来与今天求学求业的青年们共勉！

下一篇我将谈谈我是怎样“开始走上会计和经济专业的道路”的。

三、开始走上会计经济专业道路

1921年夏，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这时只希望早日就业，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不久我从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看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招考留学生，录取后，每月可供给膳宿费80美元，往返路费、服装费全部由公司负担；但报考要有国内著名大学保送。这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赶紧向圣约翰校方申请，学校同意保送。考试结果，我在上海考区圣约翰保送的4名考生中，竟名列榜首，被录取了。不久，即去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

说起来很惭愧，现在我被有些人称为“会计专家”，甚至过誉为“会计界的泰斗”。但是，在我30岁以前我还不知道“会计”是什么样的学科呢！尽管我在南京民国法政大学也念过“簿记”课程，但对什么是簿记分录还没有搞清楚。直到我进入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才在学习会计学的征途上迈出第一步。那时，我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学“银行货币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旧中国学生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留学生选学“银行货币”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俸。我虽然也是从就业考虑出发，但是我采取了“人弃我取”的方针，选定了会计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觉得会计是一门应用面很广泛的学科，公私事业单位以及农业方面都有需要。所以，我认定我国日后对于会计人才的需要定

会逐年增加。现在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我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除了选学经济学、商品学、销售学、市场预测等以外，尽量选学有关会计的学科，如初、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当然这只是三十年代的会计学课程。五十年代以后，会计学的分科更多，我只是跟随时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学习，才免于落后。这是后话。当时，哈佛企业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主任教授，是年过七旬的科尔（W. M. Cole）博士。他的会计学识虽比较守旧，但讲解得很透彻，习题也非常多。我一生会计学的基础，就是在这里奠定的。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就预定要在毕业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因之，我在哈佛这二年的课业非常繁重，不仅要学好必修、选修各科，还要准备政治经济学博士考试的各项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日以继夜地勤学苦读，星期日和假期也不休息，放弃了一切游览娱乐。两年期间，我未看过一场电影，也未到餐馆吃过一顿饭，从清晨到深夜，都是在自己租赁的宿舍内或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有时连饭也没有功夫做，只好买个面包就着一杯温水充饥。

我在哈佛大学苦读了两年后，取得了企业管理硕士学位（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随后我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一步攻读博士课程，那时担任这一门课程的主任教授是当时在美国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西里门（siligmen）博士课程要博览广学，以自习为主，上课时间较少，而我在纽约和另一个同学合租的宿舍很小，不免彼此干扰。因此，我干脆把学校的图书馆作为自己的自修室，

每天从开馆起直到晚上闭馆止，我总是带上几块硬面包充饥，整天在图书馆学习。英、美、德、奥各学派的经济书籍我都借阅，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也读过，但当时不是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挑《资本论》的眼子，批驳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这是何等可笑。

博士考试，需要撰写一篇论文和通过口试。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中美贸易论》(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写好后，经助教初审，对我的论文曾吹毛求疵地提了不少问题，并要求我重写某些章节，这使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在西里门主任教授复审时，却盛赞我的论文广征博引，写得不错，才使我安下心来。毕业考试的前几天，我因苦读过度，不仅精力不济，而且思想混乱。为了镇定情绪，我干脆把一切书籍都束之高阁，整天到纽约各大公园去参观、游览，呼吸新鲜空气，倒也很有效果。考试那天，我精神饱满，体力充沛，对主考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对答自如。最后，考试团一致决定，授予我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Ph. D. in Political Economics)。

1924年，我从美国回到了离别三年多的祖国上海，先后担任了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和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之职。我在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引进并讲授了西方新式会计，培养了数百名大学生。由于我在教学和管理上素主严谨，对学生要求亦高，有时不免难以为青年同学所接受，也束缚了他们的自由思想。

1927年1月，鉴于当时工商界通用的旧式簿记亟待改良，企业会计需才孔急，我辞去了各大学的教职，自行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师业务，并编译出版会计

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逐步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这些，以后我将分段详细叙述。

回顾上述经历，我是在旧中国迷茫的境遇中，通过个人盲目曲折的摸索和苦斗，最后才走上了会计经济专业的道路。对今天来说，这当然是不可取的。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根据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自觉地报考各类学校，在优越的条件下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毕业后即可奔赴四化建设的征途，而绝无失业之虞。与旧中国比较，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四、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早在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就颁发了《会计师暂行章程》，领到农商部会计师第一号执照的是谢霖先生。他在北京组织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但因当时他还担任中国银行总行的总稽核职务，所以并未积极执行会计师业务。当时国内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性质和业务范围知之者寥寥，因而会计师业务未能普遍推广。1921年，徐永祚先生在上海开设了“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这时，全国领有会计师执照者仅有13人，1925年3月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亦只有会员23人。为了提高各界人士对会计师职业的认识，我们在上海会计师公会成立时发表的“缘起”中指出：

“夫会计师制度，实为经济进化之产物。际此工商业勃兴，企业组织日益复杂之秋，举凡创始之设计，平时之检查，以及收束之清理，胥有赖乎会计师为之整理臂划，方诸律师、医师，其社会相需之切，未为多让，而又处于超然之地位，本其独立不倚之精神，证明财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信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其影响所及，正不独直接之利害关系人而止，此美国所以有‘公共会计师’之称也。”

1927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会计师注册章程》。其后，会计师移归工商部管辖，又另颁发了《会计师章程》。1929年，立法院又制定了《会计师条例》，并公布施行。至此，会计师的职务范围便逐渐确定。比如《会计师条例》第一

系明确规定：

“会计师受公务机关之命令或当事人之委托，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清算、证明及鉴定各项事务。”

“会计师得充任检查员、清算人、破产管财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

“会计师得代办纳税及登记事务，并得代撰关于会计及商事各种文件。”

同时还规定：“会计师不得兼任公务员或工商业之经理人员或董事、理事；对于其有利害关系之事件，不得执行业务，不得利用会计师地位，在工商业上为不正当之竞争；对于受命、受托事件，不得有不正当之行为，或违背废弛其业务上应尽之义务。”

由于有了这些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会计师业务发展较快，到1933年，全国注册会计师人数已达1,246人，天津、广东、武汉、浙江、九江、南京、山东、重庆等省市亦相继成立“会计师公会”。但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专业者，仍远不如医师、律师那样普及。

鉴于当时国内除大型银行外，采用新式簿记和会计制度的工商企业为数极少，而且会计界的许多人士都有改革旧式帐簿的要求，我辞退了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在上海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39号设立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决心以会计师业务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一心一意为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奋斗终身。实践中，我深深感到，要开展会计师业务，首先要取信于社会。因之第二年我取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并以建立信用，争取他人对我们的信任为事务所的第一主旨。后来，我又把它引申成“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把它作为我们办理各项会计事业的训条，要求立信会计同仁共勉。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正值我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时期。当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成立了主计处，在监察院设立了审计部，陆续制订和颁布了一些经济法规，如《公司法》、《会计法》、《营业税施行细则》、《银行业收益税法》、《所得税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等等，大大增加了社会上对会计、审计工作的需求，因而促进了会计师业务的发展。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成立之初，只用了一个计核员作为助理，这时不得不扩充人员，钱乃澂、顾询、许敦楷、郭驹、张蕙生、钱素君、李鸿寿、蔡经济、王澹如、陈文麟、王逢辛、唐文瑞、施仁夫、管锦康等会计师，以及李文杰会计师兼律师、周鯤律师等都先后来我所工作。人员增加了，所址也不断扩大，几次迁移后，到1936年2月搬到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办公时，全所已有成员50余人，租赁房屋十余间，分设有计核、信托、法律、文书、编辑和总务六个科，十年中承办的各种案件达四千余件，另附设有一所会计学校。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所。如1939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桂林分所，1941年由王逢辛会计师主持设立了重庆分所，1946年由张蕙生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南京分所，同年由蔡经济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广州分所，1948年由管锦康会计师主持设立了天津分所，等等。

当时本所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和中外合办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申新纱厂、永安纱厂等。还

有不少公营工商企业和人民慈善团体也委托本所办理各项业务，如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本所业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接受的委托任务遍及全国，赢得了社会的信誉。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日，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纷纷募捐支援。当时传说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但是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本所受委托稽核了十三个经募单位的帐目，证实共收到捐款 502 万余元，援助了东北义勇军 337 万多元，其余 165 万多元作了慰劳十九路军和救济上海战区难民之用。我们将全部收支帐目，出具证明，公诸社会，以后指责和谣言也因之平息。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当时中国银行总行迁往香港，该行代表伪中央银行发行法币钞票，发行钞票规定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作准备金。我担任了中国银行准备基金的检查员，每年都要亲自进入金库，严格抽查盘点实物，核对帐目，然后出具证明登报公布。这次当我前去香港查核该行发行准备基金时，发现金银准备不足，而是以其他银行的本票来抵补，不符合规定，该银行特派某副经理跟踪来上海，威胁“以破坏抗战”的大帽子相压。我终不为谋私利而失信于民。从此，就坚决辞去中国银行发行准备基金会会计师检查业务。

我国会计师职业不是从我开始，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只是我立信一所，而我之所以能略有信誉并稍有成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 树立信誉。我认为会计师的信誉很要紧，可以说是会计师业务的生命力，所以我把我的事务所改名为“立信”，就是要取得社会的信誉。但是，资本家委托会计师办事，总希望对他们有利。这样，有个别会计师就以造假帐或出具不真实的证明书以迎合某些委托人的要求，而取得会计师业务。但是，这种业务我所是绝对不接受的。我宁可放弃这种委托，这样，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吃亏”了，但日子一久，就会给社会人士产生一种印象，认为“立信”是信得过的，是可靠的，反而会引来大批的业务。“立信”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当时，这是从个人事业出发的。今天，我们会计人员应当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权限，让党和人民信得过，努力为四化做贡献。

(二) 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介绍会计人才就业。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里，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和至亲好友的介绍，要找到一个职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很关心会计人才的前途，尽可能介绍会计人才就业。除了对本所德才兼优的学员大力进行培养外，还尽力介绍社会上的会计人才就业。如我所新成立时，就从东南和暨南大学商科毕业学生中，选用了顾询、许敦楷、蔡经济、王澹如等学员就业，还登报招考录用了韩曼涛等同仁就业。对自办的会计学校毕业生，除了留用一些成绩优良的同学在我所工作外，一遇机会，我总是竭尽全力介绍他们到各机关、企业去工作。后来，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立信会计职业咨询所”，大力开展了这项工作。通过职业介绍，不但扩大了会计人才队伍，也有有力地促进了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的发展。

(三) 建立会计专业制度、培训会计专业人才。古时王

荆公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用现在的话来解释，法就是制度，吏就是人才，要理好财，必须首先设计会计制度，健全财务管理，而有了好的制度以后，还必须有公正无私、忠于职守的专业人才来执行。所以，我把这段话作为事务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把它作为序言写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同学纪念册上。我在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初期，就深深感到非改良企业会计制度和训练专业会计人员不可。因此，我即从这两方面着手，一面附设了会计补习学校，一面自行编译会计书籍，并开设图书社，把事务所、学校和图书社三者融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现在看来，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立信会计事业从客观上来说，只能还是为企业主的利益服务，其在会计专业制度建设和会计专业人才的培训方面，也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我们今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事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五、创办私立立信会计学校

会计是一门实用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遍及于各行各业。它既需要精通业务，具有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也需要会精打细算，具有做帐能力的中级和初级会计人员。所以我创办会计学校先从补习职业教育开始，逐步充实发展为正规的专科学校（解放前称为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但由于我过去单凭个人奋斗和依赖社会上少数热心的实业家资助，力量是很有限的，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发展规划。

1927年，我们先设立了簿记训练班，以在私营工商企业工作的青年小职员和练习生为对象，利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上课，由事务所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担任教师。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在于改良旧式“帐房先生”的上收下付记帐方法，传授西方复式簿记的技能和知识。开办初期，仅有学生23人，从第二期改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以后，学生人数大增，事务所原有教室已不能容纳，不得不在河南中路吉祥里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这样，除继续吸收在业青年外，还录取失学、失业青年入学，仍在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由于讲求实效，符合社会需要，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课程也逐年增多，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了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

为了充分利用学员业余时间和学校教室，我们还办了“晨校”、“星期日校”、“速成班”等多种教学形式。“晨校”是为在业青年利用夏季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上学；“星期日校”是为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来我校补习簿记会计知识，以适应日后就业的需要；全日制的“速成班”，是为外地来上海求学的学生开设的，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在速成班学完五门必修的会计课程。

补习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境比较清寒，多系失学、失业青年。他们为了取得一技之长，以便于谋求职业，都勤奋苦学，学习成绩大都优良，普遍得到工作单位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信誉日隆，发展迅速。从1927年到1947年的20年间，共计举办了40届，前十年入学学生4,783人，后十年发展到30,746人，最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每学期招生都在二千人以上。此外，我们从1930年起，还设立了函授学校，以解决外埠学生无力来上海求学的困难。据1947年底的统计，先后报名参加函授的学生有7,063人，遍及20个省市，还有香港、澳门和南洋群岛新加坡一带的学生。

那时，我鉴于补习学校学生虽众，但肄业时间太短，学习的课程较少且浅，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这对就业、工作和进修都不利。因之我们决心筹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即得到事务所同人和校友们的通力赞助，筹集了建校基金17万元国币，敦请经济、会计、教育家和实业界的著名人士为校董，经当时的教育部备案后，于1937年7月开始招生，先在市区校舍开学，并准备在徐汇区新建永久校舍。但不久因抗战爆发，只得暂行停办。

1940年7月，我只身经香港到了重庆，立即着手将刘芷休等所设的重庆立信会计分校加以充实改组为专科学校。当时最感困难的是校舍问题，我费尽了心血，才在北碚租了某私营房地产公司的一处房子。不料，该公司又突然改变计划，要把这处房子卖掉，而不愿租给我们。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求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经理老板们，以替他们培养企业会计理财人才为理由，请他们捐款，才把这处房屋全部买了下来，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

北碚离重庆市区80公里，为了使市区职业青年能有业余深造的机会，我们决定在市区添设专科班，这样又需要在市区解决房子问题。同时，事务所和会计图书用品社也需要办公用房，于是，我们想在市内自建一栋“立信大楼”。那年正当我满50岁，便以立信同人和校友为我祝寿为名，公开登报申明征求各方以现款致送寿礼，并动员工商界出钱出力，大力捐赠。经过多方面努力，总算凑足了40余万元法币，于1943年在重庆市内筷子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房。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又重整旗鼓，为立信专科学校建造规模更大的校舍而奔走。我除了将自己历年积蓄的钱财全部捐出外，又动员立信全体同人和同学合力在上海工商界募款。由于当时我校已颇有声誉，许多大企业实业家都乐于捐赠巨款帮我办学。如申新纺织总公司和荣氏兄弟就捐助了法币一亿八千万元。全体校友也募集了八千万元法币。立信新校舍历时近两年，耗资十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法币，终于1947年2月全部建成，计包括一座教学大楼、一个大礼堂、一座大饭厅，还有一个足球场。这时，学校才算初具规模。

在校舍问题解决以后，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我聘请了一

些著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黄逸峰、章乃器等都先后在我校担任过教职。我虽业务繁忙，亦要抽空上一些课。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教职员生活没有保障。为了使他们尽可能生活得好一点，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如每学期开始就将本学期的教师薪水，从所收学费中一次发给；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会民主管理，预先购足一学期吃的粮食。这样，才保证了每学期上足20周课。解放以后，教职工生活有了保证，立信专科学校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1952年院系调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合并到上海财经学院时为止，毕业学生达1,500余人。与此同时，还在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三所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科学校）。自1949年起，由蔡经济等负责在香港和九龙办了会计夜校、一年制训练班和三个月一期的进修班，并先后也设立了会计专科学校，到1969年停办时，为香港地区培养了数千名中、高级会计人才。

我校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除了社会的需要，各界人士的大力赞助和事务所同人的协同努力外，我认为在办学方式上，采取事务所、学校、图书社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办学，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事务所可以为学校提供师资；图书社可以为学校提供教材和补助部分办校经费；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又回过来协助事务所和图书社发展业务。这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推动了“立信会计事业”的发展。我办了60年教育，深有以下体会：

（一）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我凭自己求学的经验，治学素主严谨，重视教育质量，注意教学方法和效果。我亲自主持校务，一切坚持“认真”二字，对师生都是高标准、严要

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认真做练习题。考核也是很严格的，考试成绩以70分为及格，还经常举办簿记、珠算、会计等学习竞赛。考试作弊者要开除学籍；一学期缺课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以旷课一次计算，等等。我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每天早晨都要带领师生一起做早操，并经常对他们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和纪律教育，以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此外，我感到妇女适宜于做财会工作，打破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广收女生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到了后期有的班级女生比重超过半数，为提倡妇女就业做了一点工作。

（二）自编自教，切合实用。我校教师大部分是由事务所的会计师和历届优秀毕业生中挑选的。他们从实际出发，自编讲义，经过二、三个学期的试讲，不断进行补充修订，经事务所编辑科审定后，才能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图书社出版发行。读者普遍反映《立信会计丛书》是比较切合实用的。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详细叙述。

（三）边学边做，讲究实效。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我校非常重视实习，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辅导助教，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疑难问题。对夜校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对正规日校学生，要请求他们苦练珠算、书法和应用文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经常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因此，我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便能马上从事实际工作。

（四）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我历来提倡节约，讲究精打细算、勤俭办校。无论在上海、重庆，还是桂林、天津，开始时都是租用中小学夜间的空闲教室上课；或利用机关、团体、企业的房屋，和他们协作办校。每校除有两三位管教务工作的专职人员外，每班5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负责管理。总务勤杂工作，大都是请租用和协作单位的职工兼办的。那时夜校教职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大体是1:20；就是正规的日校，也不过是1:10。房租、水电和办公用具都是处处节约，精打细算，因而学校经费每期都有节余。

（五）尊师爱生，团结友爱。我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下一代。所以，我总是从爱护的观点出发，对学生生活尽可能给予照顾，就业时尽力予以推荐。有的学生在校时虽感到我管理他们太严，但到了工作岗位后，才体会到“严师出高徒”的好处。许多三十年代夜校的老同学，至今还对“立信”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是和学校的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校风分不开的；特别是立信同学会做了大量团结友谊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校因为有一套严谨的教育制度，有一支理论结合实际的师资队伍，有一套完整系统的自编教材，有一批热爱母校的历届同学支持，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迅速发展壮大，为培养我国财会专业人才，促进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微薄的贡献。我想立信的上述办学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财会教育事业，可能会有某些值得借鉴之处，因此，特回忆叙述，以供参考。当然，由于个人水平和解放前的社会条件，立信的这些经验也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局限性的。

六、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

我留学美国期间，就陆续写过一些经济、会计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周报》上。归国初期，我又写了《公司财政》和《簿记及会计学》两本书，引进了一些西方新式会计科学知识。以后，在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接触中，我深感我国会计业务水平太低，不能适应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那时大学里研习会计科学者不多，教科书大都是外文原版；少数译著亦以簿记居多，缺乏高深之作。为解决会计教材，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内设置了一个编辑科，由我亲自领导，配备了一批专职人员，开始编译簿记、会计、审计等书籍，出版了一套立信会计丛书。我吸取了自己学习会计的教训，在编译立信会计丛书中，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书的内容必须切合实际需要，有关理论和实务的论述，都要从实际出发，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原则。对引进的国外先进学术，我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在现行法规和工商惯例的基础上，适当采用。教科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课程，分别编撰。每书的章节之后都附有思考题和习题，供学生复习参考。书稿写成后，先作为讲义在我校试讲，经二、三学期试讲后，根据师生们的讨论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然后由事务所编辑科审定编排，成为正式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

（二）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举例做到不厌其详，使读

者能够无师自通。例如，《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由我亲自主编，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各章顺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并经实地试教，几经修订，设有教学进度分配表。每隔若干章，就设一章复习，要求学生反复演习，务求熟练掌握所学内容。结业前，还要布置一整套模拟式业务实习题，让学生去做，以求参加工作后能很快胜任工作。因之，该书为各商业企业、会计学校广泛采用，修订过四、五次，再版几十次，畅销国内外，直到现在，台湾、香港等地还有人在翻印发行。

（三）译文力求统一，含义力求确切。译稿都经我亲自审阅，几番修正润色，力求译文统一，含义确切。如《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是鉴于当时我国会计名词极不统一，各种书刊的译法都不一样，给编译工作、读者和实务工作者都带来不少困难。于是我组织编译工作同人，不时探讨，收集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先把国内会计书刊原有的翻译名词开列出来，然后从中选定一个适当的译名或者由我们暂时拟定一个统一的译名，并加以注释。用词力求言简意赅，适合我国习惯用语。该书出版后，曾修订过两次，对统一我国会计名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65年，还有人在香港冒以最新修订本翻印出版。

截至1936年底，我们编译的各类簿记、会计和审计书籍共有5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会计学》，它除了论述普通会计所应包括的内容以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清算及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对于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当时比较新颖的会计内容，亦作了较深入的研讨。各章都列了许多练习题，便于

教师施教，学生选择练习。是书之成，历时十四个月之久，我排除百务，专心从事，寒暑无间，并得到六、七位同人相助，经多次修改，才得以付印。

194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迁到了香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无力继续为我们出书。那时我已到了重庆继续办校，眼看学校教材无法解决，不得不另谋出路。后来得到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欣同意，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了《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筹资，于1941年6月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除了出版发行《立信会计丛书》外，还印刷帐簿表单，满足了工商企业之急需，各方称便。以后，该社还在桂林设立了分社，在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设立了特约经销处。为了适应高中商科及职业学校教材的需要，我又自任主编，于1941年编辑出版了一套内容较为浅近的立信会计教科书，计有：商业簿记、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和审计学七种书。抗战期间，各地大专院校和自修会计的学生，十之八九是采用我们编的教科书；中专学校几乎无一不是用立信会计丛书作教材。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后来我们又编印了一套财政、金融、保险、贸易、统计、计算技术、企业管理等立信财经丛书。

抗战胜利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从重庆迁往上海，业务更加发展，自设了印刷厂，又在南京、天津、广州三市增设分社，特约经销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向港澳、南洋群岛一带推销书籍。后来由于交通中断，无法继续向海外供应，香港便自行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新编出版丛书二十余种。

上海解放前夕，我为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些会计新理论，又组织力量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社”（解放后改名为“立信会计研究编译社”），编译出版了一些会计新著作，并对一些旧的丛书进行了修订。解放后，我又自学了俄文，并努力学习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经验，翻译了一些苏联的会计书籍，还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等普及读本。

至1956年初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结束时为止，先后共出版发行各种会计书籍不下一百五、六十种，其中由我著作、翻译和主编约有三、四十种。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

在我致力于编辑丛书的时候，我的上海同行徐永祚会计师在1933年1月起编印了《会计杂志》月刊，受到了当时工商界和会计界人士的欢迎。我也不甘落后，于同年7月，将原立信同学会编印的《会计季刊》重新复刊，自第二卷起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该刊由于时局影响，断断续续出刊，到1951年停刊时，共计出了18期，每期约10余篇文稿，20万字左右。由于内容比较精深，又及时移译国外会计新文献，介绍国内行业会计制度和政府财会法令规章，颇受读者的欢迎。

此外，为了加强立信同人、同学之间的联系，切磋学术和敦睦友谊，还先后编印了《立信周报》、《友讯》等几种不同形式的刊物。1949年11月至1964年3月，在香港也出版了《立信会计月刊》，共发行172期。

1980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校以后，为解决财会教材奇缺的问题，又组织原立信会计研究编译所的部分同人，于1981年2月成立了立信会计编译

所，专门编辑《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财经丛书》，并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大力支持。三年来，已出版各种财会教材和参考书近20种，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今后还要不断充实编辑力量，增加出版门类和品种，为四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财会书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引进并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是必要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但必须是实事求是，切合我国国情，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当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振兴时期，又面临世界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要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加强财会工作在信息、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上的职能作用。因之，迫切要求我们财会工作者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已垂老，心余力绌，寄希望于后起之秀，青出于蓝必胜于蓝，一定能更好地完成新的任务。

七、立信同学会

上面已经谈到，私立立信会计学校是以补习夜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生大都是工商企业的基层小职员和练习生，或苦无一技之长，失学、失业为找出路来校学习的青年。这些年轻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不满的，富有革命心和进取心。那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大举侵略我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1931年，由顾准发起，创立了以“敦睦友谊，切磋学术”为宗旨的立信同学会（会址就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内），他组织了30多位同学，推举李建模同学为主要负责人，主持会务。顾准当时是我会计师事务所内的一个练习生，自学成才，在夜校担任“银行会计”教师，深受同学们的爱戴。顾准、李建模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同学会宣传进步、民主，更加发展壮大起来。我当时是个无党无派人士，对政治认识模糊，但对抗日是拥护的，爱国之心是和同学们相通的，何况同学会的壮大，对立信会计事业也有利。因此，我对顾准、李建模这些有志气、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是很器重和爱护的，对同学会是很支持的。

同学会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有的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如李建模同学在抗战时即参加革命，曾任江南行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财经处处长，于1945年3月牺牲。现在还健在的，也大多70多岁的高龄了。如陆修渊，现任上海

棉纺工业公司顾问、上海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梓樵、沈尉平、李燮泉、周豫康、孙琦等同学，目前仍在热心为同学会出力。

抗战期间，留在上海的同学会仍由陆修渊、高云樵、唐根才等主持；内迁的部分同学，由周信、吴履绥等负责，于1941年冬成立了重庆立信同学会，并组织了“求知聚餐会”和“互助生活社”，继续进行活动。抗战胜利后，上海和重庆两个同学会汇合在一起，再加上专科学校的师生，改组成为立信校友会。

1947年，在改选同学会执行委员会时，公推立信夜校教员高云樵（曾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司负责人，现已离休）、黄浦（现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信（曾任上海物资局副局长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受“四人帮”摧残，于1977年逝世）、唐根才等继续负责。这批校友在学业上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在同济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下，同学会、校友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了。

1948年10月，发生了立信教员黄浦、高云樵和14位同学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事件，也称为“利群书报社事件”。因为事关我校教员和学生的安全，我与陈文麟、甘允寿代表学校分头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交涉。但是营救无效，其中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三位校友，在上海解放前夕与李白、秦鸿钧等烈士一起惨遭敌人杀害，长眠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立信同学会从成立到上海解放的近20年中，吸引团结了大批的校友、同学和教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主要有：

(一) 积极参加爱国反帝、反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活动。例如，1932年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将军，同学会积极参加了募捐运动，立信教师和同学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上海社会上掀起诽谤《生活周刊》社对募捐款有贪污行为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面，检查了其全部收支帐目，并出具证明，公诸于世，使流言得以平息，已于前述。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许多学生参加了支援“一二·九”运动的第二次大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的阻拦镇压，我校同学也有人受伤。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顾准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救亡运动，在召开大会时，我校同学李少甫担任了执行主席。后来，同学会还参加了鲁迅先生的丧葬活动。抗战时期，上海的同学会参加了茅丽英烈士的追悼会；在重庆的同学会参加了沧白堂政协报告会、王若飞同志追悼会和校场口事件的集会；在北碚专科学校的同学会还积极支持学校开除三青团区队长×××和职业学生（特务）姜××，并轰走冲入我校女生宿舍、阻止某女生演出话剧的国民党宪兵。抗战胜利后，同学会积极参加了“六·二三”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大游行；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臧大咬子事件和沈崇事件；在劝工大楼事件斗争中，营救了黄浦等被捕同学；上海解放前夕，同学会在交通大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在学校驻军的护校运动等等。

(二) 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民主进步。自1936年起，同学会就分别组织了“立信歌咏队”、“立信音乐研究会”、“立信剧团”，以及舞蹈组、图书室、读书会等等，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著名的音乐家、戏剧家、作曲家和导演，如冼星海、吕骥、徐韬等都曾亲临指导。开始

时，还只在学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演出，后来就扩大到社会上去了，深得各界的好评。参加演出的同学，有些以后就成了著名的电影或话剧演员，如顾也鲁、于茵等。唐根才还自编自导，创作了20多个剧本，反映了当时职业青年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因而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多次演出曾遭其捣乱阻止，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并没有被扑灭，以后他们就转移到郊区、群众中去演出，继续宣传抗日反蒋，影响是不小的。

（三）积极编印报刊，举办讲座，切磋学术。同学会成立不久，即由顾准主编，出版了《会计季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学术刊物之一。该刊出了四期，自第二卷起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由事务所接办。1936—1937年间，同学会又编纂发行了《会计学报》，共出了四期。这些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撰写的，包括各行各业的会计制度等，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同学会还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学者，如马寅初、李公朴、黄炎培、马叙伦、章乃器等，举行学术讲座或时事报告；组织同学到工厂参观学习。此外，为了联络各地同学感情，交流工作经验，沟通情况，报导会务活动，从1934年起，同学会创办了《友讯》的小册子，断断续续发行，直到上海解放。1942年在重庆也出版过《立信通讯》。上海立信大专、高级校、训练班等各班级的同学会，在毕业时大都要印发纪念册，记载了各个时期同学会的工作。这些刊物对切磋学术，交流经验，联络感情，促进同学会的壮大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与事务所以及学校同仁，都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同学会这些活动的。

我之所以要写这节回忆录，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我校除了有它传统的学风、校风以外，同学们还有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一面。这是值得青年一代学习和继承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我当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毫无疑问，象我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过清封建皇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几个时代的人，思想是复杂的，政治认识是模糊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是比较浓厚的。但是，在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也逐步有所转变和提高。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加以培养。象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步社”、“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1940年，他辞去了我所和学校的工作，到苏南解放区去了。还有一个登报招考进来的计核员韩漫涛，我知道他二十年代就参加了党的工作。当上海租界搜捕革命者风声紧张时，我就派他到外地去查帐，以“避风头”。再如，马寅初先生从上饶集中营释放出来以后，国民党继续迫害他，不准各大学留用。我特地聘请他到我北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来任教，并把他的儿子也接到北碚来同住。马先生是一位深受同学们欢迎和爱戴的教授，他在国民党发行“关金券”时，公开在学生大会上揭露这是一个反动骗局。后来这事被反动派头子陈立夫知道了，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并命令我把马先生解聘，我也未加理睬。不久抗

战胜利，此事不了了之。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在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思想认识逐步有所提高。以后我还要谈到我的思想改造和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八、涉足会计、经济官场

我涉足国民党会计、经济官场，计有三个时期，现分别叙述于下：

（一）1931年冬，我暂停执行会计师业务，去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主计处的筹备委员，主任委员为陈其采。1932年春，我被国民政府简任为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是秦汾，他是一位学工科的留美硕士，根本不懂会计。但他跟随宋子文工作多年，称得起是宋的一个亲信。当时主计处的筹备主任、后来被特任为主计长的陈其采，和我并不相识，他只是慕我“名会计师”的虚名，特邀我去会计局担任局长职务的。由于秦汾和宋子文的关系好，所以把我屈居副职，而把不懂会计业务的秦汾任命为正职，会计局的权力全操在秦汾手中，这种官场人事的丑恶内幕，实在使我不愿久留，因之在刚刚任命不久，我即辞去了这个职务，回到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我这次涉足会计官场，时间不足半年。

（二）1946年5月，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王云五，以无党派的身分被国民党政府特任为经济部部长。他那时也想找一个无党派人士充当他的副手，以表示他的独立不偏的姿态。我那时也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因之他推荐我担任了经济部的常务次长。其实，常务次长所主管的只不过是些日常事务，如私营企业的登记、变更、停业、破产等。当时任经济部主任秘书的是徐百齐，

他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王云五的秘书多年，称得上是王云五信得过的得力助手。王云五把一颗印章交给了徐百齐，凡是部内无关重要的事务，照例先要我这常务次长“画行”（就是在常务次长名下画一个很长的“行”字）签名，最后主任秘书可以把部长交给他的印章盖在部长名下发出，不必再交部长“画行”。因之，主任秘书处理部内例行公务之权实际上超过了。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只混了一年，1947年5月就随同王云五一起辞职了。

（三）1947年秋，王云五又改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荐王云五兼任“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又推荐我为该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这个所谓的善后事业委员会原想接管一些“美援”机关，但并未成功。因之这一“委员会”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闲机关，我这个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也终日无事可做，每月坐领干薪675元法币，只够我每星期从南京回上海的路费。因此，我在这里干了不到半年，就辞职回到了上海，仍操会计师旧业，并兼任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职务。

这就是我先后三次涉足会计、经济官场的简单经过，时间共计不足两年，真算得是“短命”的了。

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里我还要赘言几句。后来当王云五被蒋介石特任为财政部部长时，他曾从南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找我，说是有“要事”面谈，要我即刻去“南京”。我只得连夜乘车赴南京见了王云五。原来是他要我担任他的政务次长，并说：“财政部的政务次长比部长职务只有一步之差，不久便会当上某些部长之职”。我当时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内部腐朽不堪，贿赂盛行，料定它不会久

长，我不愿和它同归于尽，因之，当晚即留书向王云五告别，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事隔数月，王云五就为发行“金元券”，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战犯之一。

1979年8月，我响应党的号召，曾具名写了一封《书寿王云五》的公开信。可惜传闻当时王已在台湾病逝，未能看到。兹按原稿抄录于下：

“云五我兄道鉴：

比读报纸，欣悉我兄欢度九旬荣庆，且健康胜常，矍铄依然，下风逊听，实深感慰。与兄睽违三十载矣，伦亦虚度八十又七春，每怀夙昔过从，犹在目前，翘首云天，时觉神驰左右，想望弥殷。伦以垂暮之年，处昌明之世，每当燕乐，海上旧友毕集，远怀风范，倍增停云落月之思，因缀短章，为我兄寿。

国家三十年来，旋转乾坤，厥功甚伟，前此虽受“四人帮”之破坏，稍有蹉跌，然自邓公当国以来，拨乱反正，百废俱兴，以图书出版工作而论，亦大非昔比。犹忆我兄在沪之日，彼时虽执图书出版业之牛耳，然每一书出，印数不过数千而已。即《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类书，广告焉，预约焉、附赠书柜焉，尽力宣传推销，然其印数，仍极有限。今日则不然，一书之出，印数动辄一、二十万，犹供不应求，难副众望，即此一点，足证国家文化学术之发展，非过去之可同日而语也。尤足以为兄告者，我兄创制之《四角号码检字法》，国家仍极珍视，为出版界与教育界所广泛应用，年前所出之《四角号码字典》，备受读者欢迎。即《辞源》一书，国家亦已集各地饱学之士，重加修订，俾使之更臻完善，充实内容，

继续出版。凡此种种，当为我兄所乐闻，亦足以告慰我兄夙昔之抱负也。

犹忆1949年我兄离沪之前，曾将多年收集之词汇卡片数十万张，交由伦当时主持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保存。建国以后，伦以为此属文士之心血，国家之财富，理应归之国家，俾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因代为交与国立图书馆保存。我兄曾有志于将此材料，编著中华百科全书。今国家已在京沪等地，设立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网罗人才，全力以赴，遥想百科全书问世之期定不在远。倘杖履在此，伦知当亦为之莞尔首肯也。盖使理想成为现实，宁非人生一大乐事乎？

嗟夫我兄，我等相别之时，犹当盛年，今则垂垂老矣。三十年来，虽一水非遥，然鱼雁鲜通，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念人为之障碍，每用慨然。今者，中美建交，已成现实，弟兄和合，重见端倪。故园春意盎然，桃李成荫，尚望早日归来，共襄四化大业，使我中华民族巍然卓立于天地之间，则我兄百旬荣庆之时，伦亦得叨陪末座，为兄奉觞，同伸庆贺。此为伦之素愿，不审我兄亦有意否耶？

纸短情长，不尽欲言，肃布腹心，预以寿兄，临颖盼祷，余不一一。

弟潘序伦拜启

1979年8月于上海”

上面这封信曾登载在当时的香港《大公报》上，它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思想认识。当兹全国人民正在共同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之际，特再在此录引，以表热盼祖国统一、富强、昌盛之心愿。

九、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漫长过程

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世界观，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好比攀登一座大山，在登山过程中确实感到艰难痛苦，但现在回味起来，真觉得“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我改造世界观，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回避世界观的改造；第二阶段，勉强接受了世界观的改造；第三阶段，自觉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在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之初，由于我对共产党还怀有疑惧之心，因之我对党抱着避而远之的态度。我所以抱这种态度：一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中年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的是美国教会的教育，此后，在美国留学三年，又受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教育，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认识。二是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权内，三度担任了会计和经济方面的高级官吏，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担心是否会受到处分呢？

在上面几篇中，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

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的长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那时我也在重庆，常有来往，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醮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使我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耽心要为自己招致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是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也从未去上海市副市长办公室找过潘汉年。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

我和我妻张蕙生原先同住在徐家汇徐虹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职员宿舍内，上海解放后就迁居市区，并辞去该校校长职务，由校董会推举副校长李鸿寿继任。1950年我又停止执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职务，由副主任会计师陈文麟升任。这样做，是想专心一意编译出版财会书籍方面作些贡献。在此期间，我埋头自学了俄文，翻译引进苏联的会计文献，编写了《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

著作。1952年夏季“五反运动”以后我又停止编写《立信会计丛书》的工作，并辞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职务，真的闭门谢客，作起“寓公”来了。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振撼了全世界。当时我曾有过“恐美病”，为国家的命运担忧。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开始产生了敬佩和信任，并迫切希望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我本是一个无党无派人士，经友人介绍，参加了“民盟”组织，在党的关怀下，于1957年春，我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安排在市政协学习。开始指派我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这原是给我一个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可是由于我过去没有好好学习，阶级立场尚未改变，又不善于依靠群众，难以掌握会议和胜任学习小组长的任务。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这虽然也是对我敲起了警钟，但我并没有接受教训。以后又讲了一些不适时宜的话，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给我的震动很大。毫无疑问，这时候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和苦闷的。

能使我自觉自愿地衷心乐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经受十年动乱痛苦的时候，我也受到过难以忍受的冲击，但对会计事业奋斗的志愿，却始终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当时我虽已年逾八旬，亦在绝望叹惋声中觉醒过来，精神振奋，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设的决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了解放以来的冤假错案，对我1957年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问题，给予了改正。

我更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经常参加市、区政协和民盟组织的各种学习、会议等社会活动，积极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和历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工作报告，特别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觉得我们的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几年来党中央的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所有的主张措施，都深得民心，顺乎民意。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现四化的依靠力量”；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些都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鉴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经济振兴和新的产业革命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学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倡议在上海市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同时建议大力举办会计职业教育，以解决会计人员严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些建议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于1980年秋，批准恢复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使我平生夙愿得以顺利实现。同时还任命我为名誉校长，享受高级干部的各项待遇，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我现在起步虽已晚了点，但我要竭尽有生之年，积极响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号召，自觉自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多作贡献，坚决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取之于会计 用之于会计

我国古代相传，有这样一句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把它译成近代的白话文，就是说：品行端正的人，如有过多的财富，他就会想到一生衣食无忧，因之可能耽于逸乐，不思进取。至于品行不端之人，有了过多的财富，就很容易犯衣食住行的浪费，甚至犯嫖赌等触及刑律的罪恶行为。我认为，多财总是一件好事，但一个人多了财富，首先应当考虑用财之道，应当把多余之财，用于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事业上。我一生聚财、用财之道，就是遵循这一主旨的。

前面已经说到，1924年秋我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担任了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同时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职务。当时我每月约有银币五百元的收入。同时我还写了《簿记与会计》和《公司理财》两本英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行销全国。按照当时通行的办法，我可向该馆抽取每书定价15%的“版税”，这样我每月的收入又增加了数百元。由于我生活上早已节约成性，因之不到两年，我就有了两万五千元的银行存款。有了这笔钱，我首先考虑到我留学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过我约为当时银币壹万元。于是我就以“饮水思源”之义，乐捐一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

专为帮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那时我有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王志莘，他赴美留学也是受到新加坡一位华侨资助的。他听说我要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金”，也要为他的资助人出资三千元，加在我的捐数之内，共襄这项“盛事”。但他家境贫寒，当时无款可付，我就为他垫付了三千元，这样助学金的总额成为一万三千元。此数诚是微不足道，但我们这一行动却引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几位教育界老前辈的赞许。我和王志莘就敦聘他们为基金的董事，组成了一个董事会，全权管理基金的保管和分配。接受这项奖学金的学生人数，先后有数十人，其中不少都已成才，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所可惜的是，这笔长期存在银行的基金，因国民党所发行的“法币”逐年贬值，直到这一万三千元的实值，已变为灰尘而告终。这是我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开端。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选派分赴英、美两国留学的学生，总计约有50余人。我在几年后，又约同全体同学在简先生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即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院址）内，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名教育家黄炎培老师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垂永久。听说在“文革”中亭碑俱遭毁坏无存。以上这些，也反映我当时的感恩图报思想。

从1927年起，我所设立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报名入学的学生人数很多，在上海市各区设立的总校和分校，一时竟有11所之多。这些学校的开支是非常节约的。所以学校所收学生的学费，除去教职员工的工资、房租、水电等费用外，每学期均有节余。我就把这些节余款项为学校购置了几

所校址，因而当时就有“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

1937年，我和那时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筹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我们除把所编《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每年可收版税约四万余银元），全部捐赠与立信会专外，我自己也把历年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职业收入中积累的银元六万元，捐给会专作为建校基金。这就是我立信同仁“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的一项实例。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重庆回沪，同时把原由上海迁往重庆的会计专科学校迁回上海。当时上海徐家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还在筹建之中，一时专校无校址可用，因之我就把我原建在上海长乐路（那时名为蒲石路）的五开间三层楼的一所住宅，捐赠与专校作为临时校舍。后来这所校舍就成为专校夜校部的永久校舍，并利用它的日间空闲，创建了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中等专业学校。在建造徐家汇新校舍中，我自己又捐出一万元美金，建造了一座体育馆。

在全国解放初期，上海、重庆和广州等地，各类私立立信会计学校陆续移交给当地人民政府接办时，除了几十座校舍和大量图书、设备外，上海专科学校还存有现款人民币四万五千余元，重庆高职校也有现款五千元，都全部移交清楚，涓滴归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现在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就不再去说它了。1979年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财物，全部作价人民币八万余元发还给我。我得到这笔发还的钱以后，当时想到自己已是年逾八旬，风烛残年，我

的两个女儿也都已自立，我老夫妻俩人毋需拥有这样一笔巨款。那时，正当上海市会计学会成立，我就把发还的半数四万元，捐赠该会作为基金。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我真万分高兴。我又从剩余的四万五千元银行存款中捐赠三万五千元给学校，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为数过少，后来承上海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现任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顾问杨国树同学捐赠了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又承上海立信纸品厂捐助一万元和前重庆立信校董、现是香港企业家查济民先生慨捐一万元，这样，共凑足人民币十万元之数，以我的名义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有了这个基础，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立信校友，象过去一样集腋成裘，慷慨继续捐赠，使基金数额日益增加，为祖国造就更多更好的会计人才。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这就是我一生聚财、用财的目的和归宿。

十一、发挥晚年“余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使万象更新，百业复苏。象我这样一个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复。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当然希望我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大好形势下继续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立信会计事业发扬光大，并能在振兴中华的年代里，为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这对我的晚年将是个莫大的安慰！

自粉碎“四人帮”后，我就矫正了自己的学习日程，经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眼镜，手握放大镜，认真阅读各种报刊和“学习参考资料”。在双目疲乏，卧床休息时，则整天在收音机旁收听国内外政治、军事、法律、财贸、科技以及体育比赛等新闻，从不间断。在我体力许可的条件下，我还尽量参加各种政治、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近年来，我年老体弱多病，但国内外来信来访的人日益增多，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胜任，难以应付。

鉴于我国企、事业各界的会计工作人员量少质差，青黄不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在1979年就倡议并大力资助，在上海市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随即开展了各项学术讨论，出版了《上海会计》（初名《会计通讯》）和举办了业余会计专科学校。翌年，全国会计学会成立，我被两会都推选为顾问。

1979年3月，我出席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会联合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1984年社联再次开会，又推举我为顾问。1980年7月，我参加了教育部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讨论会。同年我还响应党的“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号召，向上海市党政领导建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在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按照过去立信传统的办法，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学生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学校对口定向培养，择优推荐等办学方式，并附设有大专夜校部、中专程度的会计职业学校和函授部等。我担任了该校名誉校长。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社会主义的会计职业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是1982年9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和同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对我校的评语）。

现在除上海外，重庆、天津、南宁等市，以及我的家乡江苏省宜兴县，都办起了立信会计学校，其中有些是单科选修制的，有些是职工中专制的。最近，广州、武汉等市的立信校友们，也都在筹办各种程度的立信会计学校。

1980年12月，我参加了人才问题的讨论，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我首先指出：我国从开国以来，直到最近几年，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是一锅煮、铁饭碗的办法，因而产生了种种浪费情况。我认为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计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我的这项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教育界的重视，上海《文汇报》把我写的短文《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首先刊出（见1980年12月19日第三版），接着北京《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写的另一篇短文《培养人才，也要计

成本》(见该报1981年4月2日第二版)。教育部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召开会议展开专题讨论，还在个别大专院校进行了教育制度改革的试点。

1981年元旦，全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宣告成立，我被推举为董事长，前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担任了该所的主任会计师，同时有好几位前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同事，如王澹如、管锦康、施仁夫、唐文瑞、黄子仁、蒋春牧、潘子石等同志，共同组织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并推举我任编委会主任。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积极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财经丛书》等20余种书籍。从此，以前所称为“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形式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历届上海市会计学会年会上，我都亲自出席并讲话，提出一点新的见解。开始时参加过统一借贷记帐法和会计阶级性等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的讨论。1982年年会，我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当年会计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即（一）要打好会计工作的基础，提供正确成本、利润数据；（二）会计人员要放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三）要培训会计人才；（四）要编写会计教材，特别要重视农业会计等问题。《世界经济导报》还在第84期上，以“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为题，为之登载。从这些观点出发，在1983年9月《经济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时，我又作了以下阐述：我国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财务、成本管理方法，已初具管理会计的雏形。不过由于过去我们的企业是以“生产”为中心，忽视经营，因而效果不显著。为了发挥管理

会计的职能，要在做好传统的记帐、算帐、报帐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控制和反馈作用，逐步开展经营分析、前景预测、方案比较、预算控制等工作。财务会计工作还要正确处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只算本单位的小帐，不算全国一盘棋的大帐的倾向，等等。以后，我还应《农业会计研究》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加强农业会计研究，做好农业会计工作》的文章，贯彻了我一向重视农业会计和开展函授教育，为广大农村服务的主张，刊载在该刊创刊号上。1983年，上海市会计学会召开第四届年会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专门讲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发表在当年《财务与会计》第4期上。在第五届年会上，我又提出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们会计界该怎么办的问题。

1983年，我还写了一篇《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把我在青年时代的坎坷往事，误入歧路的曲折经过，如实地叙述出来，刊登在《青年一代》1983年第1期上，希望对失足青年们有所帮助。此文发表以后，曾得到广大青年和会计界同志们的欣赏；先后在《人物》、《商业会计》、《安徽财会》等刊物上加以转载。最近，还在《青年一代》杂志的好稿评选中被选中。

在1984年7月的立信上海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我勉励全体校友发扬立信传统精神，在各种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有益于学校名誉的事。

我的回忆录暂时写到这里为止。由于我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各期大都是由我的学生、助手丁苏民同志笔录的，难免有遗忘、不全之处。自连载发表以来，不断接到国内、外读者来函来稿询问，或提出补充修正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附录：

一、潘序伦与立信会计事业

——悼念老会计师潘序伦博士

李文杰

经济学博士宜兴潘序伦（号秩四）老先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会计、审计学会顾问，上海审计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名誉校长，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是一位中外驰名的前辈专业会计师、会计教育家和著作家。

今年是潘老执行会计师业务六十周年，他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新建十六层校舍，亦于今年奠基兴建，这是全国会计界人士、潘老海外故旧关注的、立信会计事业有关人士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上海立信专科学校、会计、审计学会、立信校友会等团体于10月25日下午在上海举行潘老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同志亲临颁发荣誉证书。我去福州开会后，特地飞往上海躬与盛会。潘老已病卧医院，我抵沪后，即前往探视，在榻前谈话甚久。11月5日返京，11日接立信专校讣电，惊悉潘老已于11月8日清晨辞世，享年九十有三。医院一面，竟成永诀，不胜哀悼！我以事羁，不克去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哭挽一联曰：“尽瘁六十年，办学、著书、创业，时刻发扬光大，毋

忘信义；缔交半世纪，切磋、提携、教导，朝夕观摩仰望，永记铭箴”。谨草一文，聊志哀思。

“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是潘老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所立的校训，也是他创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开办多层次、多种型式的立信会计学校、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时，带领立信同仁所身体力行的主旨与方针。

立信会计事业的核心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1927年1月由潘老创设。开始只在原上海爱多亚路与一同乡律师合租一间办公室，只用一位佐理人员。建所后十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所办立信会计学校工作人员数以百计，本部设在江西路，租用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四楼半个楼面。根据事务所《办理业务规程》及《承办业务项目》的规定，事务所业务分十个方面，四十六项，自1927年至1935年上半年就已经办案件4,600件，分十八类，以定期及临时查帐567件，商号公司登记738件，商标注册1671件为最多，清算及各种信托有150件。以事务所为基点，立信会计事业的规模，由小到大，业务项目由少到多。数以千计的企业、机关，委托立信事务所办理过数以万计的案件；各地各级各类立信会计学校培训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专业人才其中有作家、教授、研究员、会计师、经济师、企业家，如在北京的许毅、黄凉尘、高云樵、吴履绥、黄菊波、单世充、韩淑芳等，在上海的顾福佑、陆修渊、黄浦、孙庆元等，在香港的杨国树、钱学钧、吴文鼎；编辑发行了数以百种计的会计书刊，供数以千万计的读者阅读；数以十万计的工商企业使用立信会计帐簿。

立信会计事业的三大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围绕发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这一核心，潘老亲手紧抓办学与著书两件大事。在致力会计教育，培训、输出会计人员方面，在上海办有专科、高级职业、分科补习班（分日班、晨班、夜班、星期日班）、函授学校，在北京、天津、重庆、桂林、兰州、衡阳、广州、香港等地，广设分校，培训会计人才。事务所的会计师，全部在自办的学校里分任教职员，还到东吴、暨南、复旦、大夏等大学兼课；低级助理人员则分任改卷的助教，这样不仅解决师资问题，使他们边教边学，也起到培训干部的作用。潘老还推荐有水平的立信毕业生去事务所较大委托人的企业，如永安纱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章华毛纺厂、茂昌冷藏公司等单位任财务主管，这样不仅为委托企业输送专业人才，也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潘老曾对我说：国内棉纺织染厂的工程师，一般是南通纺织学院毕业的，但是他们工厂的财会负责人，一般地也都是立信学生。现在在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成都、杭州、新疆、重庆、无锡市、宜兴县、南京、广西等地均先后成立立信校友会，说明“立信桃李满天下”的盛况。

在致力业务学习与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会计书刊方面，立信事务所拥有一个由顾准、黄组方、王澹如、施仁夫等同志组织起来的班子。它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二百多种；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共同出版《立信会计季刊》；还出版宣传会计经济法令及适应开展宣传业务需要的《立信月报》，分别寄赠委托人。立信同仁除做业务工作外，把学习、研究、看书、写书与教课一样看作自己的任务。我写过发行数及再版次数最多的《簿记初阶》及与潘老合著的《所得税原理及实务》就是在潘老的大力动员下写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立信会计

丛书》，给立信有限的版税以及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发行丛书的版税，为事务所集体所有。抗战胜利后，由潘老捐充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徐家汇新校舍建筑经费。最近由潘序伦、王澹如为主委的立信会计丛书编委会，编辑书刊，将以适应新时代和新要求的面貌问世。

潘老创兴立信会计事业取得较大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我与潘老合作共事半个世纪，对于以下七点，体会深刻：

一曰大事看得准，抓得紧，讲效益，一抓到底，小节也不忽略。

发展事务所业务，采用多种型式依靠社会力量办学，从事学术研究，编辑出版会计书刊，三件大事亲自一齐抓，抓到底。不仅如此，潘老还善于掌握和利用时机，发展立信事业。记得193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直接税署开徵营利事业所得税，他就立即为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办起培训班，亲自讲授自编教材，与我到群众团体、同业公会、大企业及无锡、宜兴等地作税法宣传报告几十次；还与我合写《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以应社会上的需要。事务所从而接受查帐、设计会计制度、担任常年会计顾问的事项多起。

近几年来，潘老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守职尽责，在所写文章及讲话中，曾就农业会计和乡镇办企业会计需要健全；财务会计业务应该改革创新，走向电算化，迎接新的产业革命；会计教育应该改革等重大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显示他站得高，看得远，年老志不衰的恢弘气概。

大事抓对了，对小节潘老也绝不忽略。有闻必录，有事必记；有客必会，以礼相待；友生来信，亲笔作复，有问必答。去年我去香港，黄秉章老会计师看到他给我的亲笔信，文

字工整，盛赞潘老精力充沛，一丝不苟的精神，不减当年。

二曰政治倾向进步。

潘老虽先后相距二十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和经济部短期做官，以不习惯于官场生活，仍挂冠回上海继续做会计师，写书、办学。立信事务所和立信同学会曾掩护不少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如顾准、黄逸峰、黄浦、陆修渊、周信、高云樵、唐根才等；重庆立信专校抵制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压力，聘请马寅初、章乃器等进步人士专任教授；在黄炎培、邹韬奋、杜重远等的带动下，潘老在抗日、救国、民主革命运动中捐款出力，反映他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潘老十分关注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王云五是他的老友，他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公开信，劝王回归大陆，可惜这位弃商从政的实干学者，在没有看到这封信前，已在台北去世，但这封信在海外的影响很大。

三曰气度大，善于用人。

潘老气度宽宏，从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善于识人，用其所长。如沪渝立信事务所业务先后由顾准、钱乃澂、李鸿寿、陈文麟、王逢辛等主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会计补习学校、会计函授学校，由李鸿寿、陈文麟、蔡经济、管锦康、甘允寿、顾树桢、孙庆元等主持；立信会计丛书编辑部由顾准、黄组芳、王澹如、施仁夫等主持；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由蒋春牧等主持。我不是潘老的同乡、亲戚、同学、学生，通过社会接触，成为知己，1936年辞去通易信托公司总稽核职务，被邀进事务所担任信托科主任、法律科副主任，抗战初期，提升为副主任会计师代理主任会计师、立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

董会秘书兼教授。潘老对我信任有加，我在协助他搞好公共关系，招致业务等方面出了些力。一大批立信同人，心甘情愿地在潘老领导下为立信事业效力立功，成为立信事业兴旺发达的因素。

四曰搞好公共关系，开辟业务来源。

潘老经常对负责对外联系业务的我说，一定要处理好事务所内外、上下、左右、前后、新旧之间的关系，与会计师同业及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及经济界人士要更好地配合。这样就能借助外力，减少阻力。他参加“联青社”与“扶轮社”中国经济学社、银行俱乐部、星五聚餐会等团体，就旨在与中外工商界人士取得联系；他鼓励我参加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商社等团体的活动，也着眼于广泛交游，发展业务。潘老受任国民党政府二五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建设委员会所属厂矿、水灾救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等的委托，担任常年查帐员，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高级会计顾问；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如永安系统、刘鸿生系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工商企业均委立信为常任会计师；立信事务所委托客户中，外商也最多。立信事务所与社会各个方面结成一个公共关系的网络，横向树立信任，施加影响，发展业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与正则事务所谢霖、正明事务所徐永祚，公信事务所奚玉书比较起来，立信事务所委托户最多，业务最广。

五曰集财有道，散财有方。

立信事务所委托人有政府机关、大企业、还有洋商，公

费收入除开支外，盈余不小；立信会计丛书版税及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利润丰厚；潘老确曾靠立信事业而成名发家。但是，他在创办学校、资助亲属潘铤甲、潘兆申、管锦康等出国留学深造及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也放手使用自己集聚起来的资财。委托他的老师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经管“思源”助学金；筹措资金（包括自有的、立信所有的和社会捐款），建造重庆立信大楼、北碚立信专校，上海立信专校（在徐家汇五十多亩校园里建楼多幢，棉织印染工厂及申新系统等捐款最多）。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的校舍楼房十幢，也是他捐出的。更令人钦敬的是：他把落实政策发还的资金捐充上海会计学会事业费及立信专校助学金基金。潘老以行动实践“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的信念，这样的高风亮节，对我们来说，真是高山仰上，心向往之。

六曰处劣境不灰心丧志。

立信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同业竞争激烈。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政治环境恶劣，潘老去重庆创立基业，艰苦备尝。解放后，立信事务所业务激减，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得不宣告结束。立信事业碰到的困难不小不少，潘老带领立信同人有毅力、下决心，克服着困难前进。在反右及“文革”中，潘老受到不小的冲击，他留须扫弄，抄家挨斗，逼迁陋室，不稍灰心丧志，看书会客，怡然自得。落实政策后，心情更加舒畅，他常说愿以衰年为四化贡献余热。组织上配给他新房不迁住，曾告人：专校新厦未完工，绝不个人安适作打算。

七曰勤俭朴素。

潘老日常生活简朴，斗室中一床、一几、一柜、一桌、

四椅，别无摆设；图书成堆，未置书架；不制新衣，九十华诞时，立信学生购献新制服一套，藏之箱底不穿；每天伙食账亲自勾稽，不超越预算。近年来，我常去上海，潘老是我走访的第一人，目睹他艰苦生活的情景，令人肃然起敬。

（此文是约请李文杰同志撰写的，未 在《财务与会计》上发表）

二、潘序伦与立信会计学校

顾福佑 王成杰

(一)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人潘序伦先生，1921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经济博士，归国后曾任大学教授并从事会计著作。1927年夏，他设立“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翌年春，在事务所内办了个会计补习班。因补习班发展很快，同年秋，就和同事顾询、钱乃澂两位会计师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这是立信会计学校的开端。越四、五年，李鸿寿、陈文麟会计师等加入了办校的行列。以后，学校不断发展，参加办学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在立信会计学校发展过程中，李文杰、蔡经济、刘芷休、王逢辛、钱素君、张蕙生、王庭桂、管锦康、丁苏民、王成杰、杨国树、陈学文、陈永林、甘允寿、向江南等，都先后在上海、重庆、北碚、广西、广东、南京、天津、北京、兰州等地担任建校、扩校工作），直到解放后各地各种学制的立信会计学校陆续移交给政府接办为止，历时二十五年。

潘序伦先生今年已达八十七岁高龄，经历了满清封建王朝到新中国成立的几个历史时期。他在青年时代受到旧民主主义“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接着赴美国留学。回国后立志把

一生献给祖国的会计事业，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创办立信会计学校，培养会计人才，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实际行动。“立信会计事业”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业救国”运动中的产物。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旧社会自由职业者集体组织)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私营企业)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学校提供师资和教材，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为学校提供经费和图书用品，立信会计学校培养造就会计人才。这些人参加工商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之后，也促进了事务所业务和图书用品社营业的发展。因此，学校、事务所和书社是“立信会计事业”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起着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二) 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会计工作在手工作坊和商店里采用古老的简单的中式收付簿记已能应付企业管理的需要。对于西式复式借贷簿记除在殖民主义者开设的洋行里使用外，本国“帐房先生”们都不知其为何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才由几位留学日本攻读商科的学生引进了所谓“复式簿记”。先在银行界使用，以后逐渐在民族工商企业中推广和普及。可是新式会计人才异常缺乏。立信会计师们就以改良我国的旧式簿记，建立新式簿记和会计制度为己任，专门为工商企业担任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并立志兴办会计学校，普及会计知识，培育人才，以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会计是管理经济必不可少的工具。立信会计学校创办后，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会计人才，对我国

工商业采用科学管理方法，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三）以“建立信用”为目标

立信同人认为，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必须在立志、守身、处事、待人等方面，树立“信用”。要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守信重诺，严禁弄虚作假。他们深知“建立信用”对事业会产生长远的利益。因之，潘序伦先生在创业初期，就选用“立信”二字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后来学校和书社也都以“立信”为名，并把“立信”二字定为学校的“校训”。他提出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口号。不仅对学生经常宣讲，而且在同事间也时刻互相砥砺，对于是否能做到“建立信用”名实相符，立信同人，不敢自信。但从效果来看，立信会计学校很多毕业生，在当时失业严重的旧社会，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查帐、顾问业务与日俱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对“立信”的信任。也反映了“建立信用”与否和事业成败，休戚相关。

（四）从小到大，从普及到提高，迅速发展

会计师事务所开业后，正值上海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之时，委托事务所设计西式簿记、会计制度的企业纷至沓来，接着就有请事务所培训它们的“帐房先生”的普遍要求。立信会计师们考虑：个别训练，耗时费力，不如组织起来集体训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就利用事务所晚上空闲时间，设立会计补习班。这时，补习班仅是会计师业务的一项附属工作，教师和管理人员都是由事务所的在职人员担任；补习

班的开支，只是一些水电、文具、杂费；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只作为事务所的杂项收入。但开办第二期补习班时，报名人数激增，于是决定扩充，创办“会计补习学校”。随着社会对会计工作的需要日益增长和提高，学校由开始只设高级商业簿记一项课程，以后陆续增设了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学和所得税会计等学科。

后来，张心澂、蔡经济会计师去广西，刘芷休同学去重庆，先后设立了立信会计分校。抗日战争爆发后，1940年潘序伦先生由上海去重庆看到沿海战区工商业大量迁川，而当地会计人员奇缺。就一面写信号召立信同人、同学去川，同时在重庆采取应急措施，和当地其它单位合作开办补习学校。由立信负责教务工作，提供师资。由合作单位负责总务工作，供给校舍。当时曾与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中国财政学会（官办学术团体）、重庆市社会服务处（市社会局附属机关）、“新生活”运动会（国民党附属机关）、社会事业人才调剂协会（赈济委员会附属机关）、宝元通百货公司（私营企业）等六个单位合办会计补习班或学校，各有数年之久，入学人数共计一万四千人左右。当时陈学文同学也在兰州设立了立信补习学校。抗战胜利后，在向沿海复员声中，立信同人又先后在南京、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开办补习学校。在上海由于市区扩大，入学人数迅速增加，为方便各区学生就近入学，除黄浦、卢湾区自有校舍外，并先后在黄浦、卢湾、静安、提篮、南市、虹口各区租借其他学校教室，建立分校十处。

由于补校开办时间长，开办地区广泛，入学条件限制少，对职工业余学习方便等多种原因，因此补校学生人数占立信会计学校的大多数。

但补习学校学生学习课程较少，肄业时间太短，缺乏有关基础知识和理论，难以成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补校人数很多，其中有不少通过自修和锻炼，成为会计专家和经理、厂长的，有再入大专学校学习，或参加旧政权普通考试，高等考试取得一定资格的)，而且补校毕业生不具有正式学历和资格，在就业和工作上受到限制，因而在1937年创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39年正式招生开学。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立信专校内迁四川北碚，1943年又在重庆设专科市区班，以后复在北碚、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分别创建立信高级职业学校，这些都是正规学校，在经济上成为整个立信事业赔钱贴力的沉重负担。一九四一年按照旧教育部规定的设置短期训练班办法，曾由立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附设短期训练班，学习一年或一年半，以适应社会急需。1947年潘序伦先生曾有把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扩建为立信商学院的计划，后来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未能实现。

面对学校发展的前景，立信会计师同人、同学满怀信心，出钱出力支持。此时立信办校的目的就从为会计师业务服务而发展为企图大量造就人才，广泛在国内各地各界任职，以树立“立信会计”在国内的“权威”地位。为此，潘序伦先生提出过：“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号召，尽量把会计师业务收入，书社营业收益，捐给学校；把立信同人个人和集体编著翻译的《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捐给学校，作为办学基金。

立信办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广收女学生。重男轻女是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旧社会，各级学校女生人数很少，立信会计学校开办初期，同样如此。之后，各级学校的女生

入学人数虽逐渐增加，但社会上对妇女就业，仍有歧视。因而她们都想学一门专业技术以谋职业。从而导致投考本校的女生持续增加。立信同人认为妇女大都具有安静、细致、谨慎的性格，适宜担任财务会计工作。所以录取学生，不分男女，一律以成绩为准。

1949年全国解放，人民政府迫切要求各地企事业单位健全会计制度，促使学校有更快的发展。1951年，仅上海一地，立信各种学制学校(包括函授学校在内)的学生达一万九千人，其中补校就设有十所分校。

立信会计事业在沿海城市发展，是和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首先在沿海城市畸形发展有关。

(五) 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立信会计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条件，建立了各种学制，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适应普及和提高的要求。

1. 补习夜校，是适应业余人员的学习需要设立的。学生都是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在职人员，年龄较大，为了满足改帐和工商企业对新式会计的需要而来学习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失学、失业人员。夜校开设簿记、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成本会计、审计学、决算表分析等学科，每科每周学习四至六小时，每学期可选读一至二科。

2. 函授学校。采取通信教授方式，函授学生曾经遍及全国各省市，以至港、澳、南洋群岛。开设课程和夜校基本相同。

3. 晨校、星期日校。为适应不能读夜校的在职职工，利用早晨和星期日休息时间学习会计的要求而举办的课程。

同夜校。

4. 暑期班。适应在校学生利用暑假学习簿记、会计，增加就业需要的技术。

5. 日校。是对失学、失业青年和外埠来沪求学青年设立的。日校学生一般是生活比较困难，年岁较大，要求短期速成的人。因而又称“速成科”，规定两个学期毕业。学习课程除各种会计课程外，还有商业常识、商业算术、珠算等科。

6. 专科学校。属于正规高等学校，入学程度为高中毕业，经过入学考试，择优录取，学习期限二年。

7. 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也是一种正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等专业学校，入学程度为初中毕业，学习期限三年。

8. 训练班。抗战初期，旧教育部为适应后方急需各种人才，制定《短期职业训练班设置办法》，并委托各校举办各种中等技术短训班，规定学习时期一年以上。立信即照此办法开办，曾办高级会计职业训练班（高中毕业入学，一年毕业），初级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入学，一年毕业），会计职业训练班（初中毕业入学，三个学期毕业）。立信曾多次接受委托训练会计人才，设有公费学生名额。

9. 广播讲座。1950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簿记知识，曾和本校合办簿记讲座。

（六）会计学术的研究和会计教材的编译

立信会计师同人，日间从事会计师业务，晚上又多兼任学校教课，因此，感到迫切需要对会计理论与实务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从事著作。潘序伦先生从1924年即开始编译簿记、

会计书籍，交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

1928年立信补校开办后，鉴于国内会计书刊十分缺乏，而外文书籍，在文字上既多隔阂，在法律和习惯上亦多与国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结合实务编写讲义，在补校试讲。经过修改补充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随着学校的扩展，师生们在会计实务和教学中的成果需要相互交流和探讨，立信补校同学会，在1931年以顾准为主编，出版《会计季刊》，1933年改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辑出版《立信会计季刊》。除登载会计论著外，并特约各业会计专家编写各业会计制度，供工商界采用新式会计制度之参考。这些制度，后来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并先后出版。

三十年代初，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丛书》的编辑工作速度加快，截止1936年底就编译了各类会计书籍五十种。

在编译书籍工作中，潘序伦先生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不一致，对编译工作，对读者阅读都增添不少困难。于是，结合编译工作组织同人，不时探讨，积有成果，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收集会计名词二千四百余条，每条先录国内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种译名，加上立信同人选定或暂拟的译名，并加注释。名词选译的标准凡三：含义确切，习用普遍和用字简赅。该书曾随着编译工作的开展修订过两次。

那时，我国在会计方面也出现过改良中式簿记与引进西式簿记的争论。在争论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汇集各专家对于“改良中式簿记”的研究和批评论文。有关收付与借贷记帐方法之比较，“四柱”结算法和帐簿

之分割等重要问题，本书讨论颇为详细，可说是中国会计学术发展史的一页记录。

对《立信丛书》的编译工作，曾提出下列几项要求：（1）材料必须切合实际，各书关于理论、实务的论述，都要按照本国国情，特别应注意法律规定及工商界惯例。备作教科书的，对于课程标准，教材分配，均须详细探讨。书成以后，先油印作讲义，在本校试教一、二次，如有欠妥，不惮反复修改，务待教师、学生均感满意，然后正式付印。（2）说理不厌求详，尽可能做到学者阅读以后能够无师自通。（3）文笔力求流畅，一稿之成，必经几番修改润色，达到通顺、妥帖而后已。这些要求，虽未必全能如愿，但《立信丛书》先后编辑出版二百余种，畅销全国，未始与此无关。

解放前夕，潘序伦先生专心从事研读会计新著，并成立“立信会计编译所”以编译外国著作，介绍外国新理论，作为研究修订立信丛书之用。解放后改为“立信会计研究编译所”，并曾恢复出版立信会计季刊。当时鉴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会计季刊》曾讨论“基圆会计”问题。根据编译情况，又登载“会计名词增译及改译”。为了配合学习苏联经验，曾组织力量翻译苏联有关会计书籍，并编写“苏联会计述要”等普及苏联会计知识的书籍。

（七）按照严格和实用的要求培训学生

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胜任会计实际工作，立信会计学校着重加强习题演算。各级簿记、会计课程，除平时要求学生多做作业外，最后还安排整套实习题，印有“实习题附属文件”，使学生通过练习，对整个簿记工作有一个模拟实践的

机会。学校还建立助教改卷制度。由于印有习题详解，助教认真改卷，学生对自己所做习题能够复核查对，弄得一清二楚。学校并规定每学期授课时间必须教足二十星期；学习成绩以七十分为及格，以保证教学质量。为了督促学生努力学习，上课时严格执行点名制度，还规定一学期内缺课三分之一的，不得参加期终考试；迟到早退三次者作旷课一次计算。

学校经常举行簿记、会计竞赛，采取增设书法课程，加强珠算练习等办法，促使学生练好基础技能；又设置英文簿记、会计学科，参用英文习题，借以提高学生阅读英文书籍和担任英文会计工作或外贸会计工作的能力。此外，学校和同学会都组织学生参观工商企业，以丰富学生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感性知识。

学校重视体育活动。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开办初期，借用补校校舍，设有体育场地，并借用青年会篮球场上体育课。抗战胜利后，徐家汇校舍落成前，千方百计借公园、体育馆，甚至利用弄堂、通道作为体育场地。徐家汇校舍建成后，既有广大的运动场，又有宽敞的体育馆，使学生有良好条件开展球类和其它各种体育活动。每天早晨六时，全校师生举行早操，厉行点名制度，潘序伦先生经常亲自参加。

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广泛开展。1942年立信专校迁川后，学生组织剧团，演出具有爱国抗日意义的戏剧。在学期开始、期中、期末，时常举行迎新会、联欢会和毕业生送别会，以联络师生间的感情。校方还组织学生参加当地专科以上学校举办的国语、英语讲演和作文比赛，并参加地区学校举办的联合运动会，屡获冠、亚

军。专校复员回沪后，各种文体活动继续开展。一九四八年曾参加上海市大专英语演讲比赛，获得季军；参加大专学校运动会获得女子总分第一，男子总分第三等优胜成绩。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配合下，学生经常有参加工商机关查帐实习的机会，也常有外单位要求留用实习学生情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常给优秀的毕业生介绍职业，使事务所、企业、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益臻密切。后来在工商机关需要会计人员，立信毕业生需要就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学校和事务所附设了“会计职业谘询所”，择优介绍工作，从而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业。学校还有留用优秀学生当助教，并培养当教员的办法。这些，也是有利于学校迅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函授学校采用通讯教学方式，为了防止学生对学习前紧后松，有始无终，校方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如对学生习题的批改，力求迅速，解答尽量详细；发行函授刊物，作为补充教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订学习日程，规定每天至少阅读讲义一小时，练习及解答问题一小时；加强通信联系，督促学生按时学习，寄交习题。对中途辍学的，不断发函督促，务使学生坚持修毕课程。

立信会计学校毕业生中，大多数是补校学生，其中不少毕业生以后逐步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甚至理论研究者。这主要是学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努力的结果，但与在校期间的严格训练不无关系。

国民党统治期间，曾举行高等考试(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投考)、普通考试(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投考)和特种考试(有相当于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两种)。每次考试录取人选

不多，但经常有立信学生在内。如1945年旧教育部所属机关会计人员特种考试时，北碚立信会计训练班毕业生考取者达十一人之多。同年，普通考试录取会计人员四人，北碚立信训练班即占二人。重庆永利银行有一次招收练习生，规定须要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才能报考，但立信会计训练班学生可以同等学历参加考试。结果录取的十名练习生中，有六名是立信会计训练班的学生，立信其它单位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这可能与立信会计学校基础训练比较扎实，符合社会的要求有关。

(八) 经费管理坚持精打细算、勤俭 节约、自给自足的原则

立信会计学校是私立学校，它的经费来源，象其它私立学校一样，主要是向学生收取学杂费。立信补校收取的学费是以各科每周上课小时数为标准。初级班每小时收费一元五角至一元七角，中级、高级班每小时收费二元至二元五角。增设的珠算、书法、商业算术等科均按初级班标准收费。这种收费标准，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学校中，属于低标准。同时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还有减免的规定，一般可申请减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为经验证明，全免的学生，自己没有一点负担，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失去了学校培育人材的本意。

补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是用于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补校的教师都是业余兼职的，授课每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薪金总额中占的百分比很低。因为大多数职员是立信事

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的，补校职员，如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则是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杂费。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由《立信会计丛书》的版税来负担。事实上，上海补校在每学期的入学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仍只有二、三人，校工只有一、二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的兼薪。分校校工，也由所谓“二房东”（即晚间将空着的教室出租给本校的私立中小学校）的原雇工友兼任，工作只是每晚在课后整理打扫所用教室，以及照顾茶水等一些杂务，每月给予二、三元的工资。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费、修理等费，都精打细算，不容少许浪费。至于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费，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负。因此上海补校学生虽年有增加，有些学期增至一万六千人，但学校的经常费，几乎可以全靠学生的学杂费收入，有时还可略有结余，用于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补校和其他各地补校、训练班、立信专校和各地立信高职校，虽然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自给自足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因学生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既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又多，当然不能与补校相提并论。但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拨补，所以学校的全部经费亦有结余。但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学生都是走读的，学校经常费用虽大，仍以自给自足为主。至于扩充设备经费则由校董会筹集。1952年以后，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办时，除移交几十座校舍和大量校具、图书外，上海专校还移交现款四万数

千元，重庆高职校也移交现款五千元，这些都是学校平时精打细算的结果。

（九）基金、校舍和校董会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在潘序伦先生领导下，初期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支持，后期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部分盈利和立信丛书的版税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在组织领导、教员、教材和经费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条件。但学校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基金和校舍就是当时两大难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依靠校董会。

立信补校在1928年创办时，并没有“校董会”，以后按照旧教育部颁布的《补习学校条例》，才设立校董会。当时补校一切问题，立信事务所都能自己解决，因此由潘序伦先生和其它立信会计师担任校董，成立了校董会，以符规定。

补校办学方针，偏重解决就业问题。办学十年后，我国民族工商企业日趋发展，客观形势要求立信创办高等会计学校，造就会计专业人才。潘序伦先生乃于1937年依法敦聘校董，筹集基金，成立校董会，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捐赠《立信会计丛书》版权作价十万元，捐助各项设备作价五千元，中外图书约四千册，作价七千元，潘序伦先生又将他执业十余年的积余现款六万元捐作建筑基金，以上几项合计十七万余元，学校基金全部由立信事业自己解决。

旧社会开办学校，除了须有基本办学人员外，还需要社会上有力人士支持，始克有济。专校基本办学人员是立信会计师同人，第一届校董会由潘序伦先生和李鸿寿、李文杰、钱乃澂四人参加，此外，还邀请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职

业教育专家江恒源参加，期望得到他的指导。

专科学校筹集基金后，要先呈请旧教育部准予开办，三年后办出成绩，方可呈请教育部正式立案。当时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呈请案件往往会在教育部里长期搁置。因之，潘序伦先生不得不设法走捷径，借以迅速达到“呈请先开办，后立案”的目的。当时旧教育部长是国民党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的胞侄。陈其采是潘序伦先生一度担任主计官时的上司。因而就找陈当专校董事长，使教育部一关得以顺利通过。

至于副董事长，请当时我国最大书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担任。因为《立信会计丛书》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中出版，每年可收版税约银元二万元左右，捐给专校为办学基金。为谋出版发行和收取版税方便，所以请该馆总经理担任副董事长是十分必要的。收取版税，新书稿件审查出版，受到留难和挑剔，这些都要靠面子和交情来解决，这在解放前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怪。

董事中还有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由于立信事务所担任该行常年查帐会计师，所以潘序伦先生和宋汉章是熟悉的朋友。潘序伦先生捐给专校的基金六万元，需要存放在当时的中国银行，通过宋汉章的关系，可获得比较优厚的利息，这是第一次校董会推举他为保管基金校董的原因。至于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董事，因为他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学校在必要时，可以“告贷有门”。

以上是专校第一届校董会的组成和建校及筹措基金的简况。

专校筹建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建筑校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在上海的立信专校内迁

重庆，正值日寇空袭，重庆市区房屋非常紧张，因此，1942年只能向一家地产公司租赁在郊区北碚的双层小洋房六座、大平房一座招生上课。内迁复校工作初定，突然接到地产公司委托律师来信，大意说：租给你校全部房屋，已经约定出售，买主出价十万元，按照本地习惯，现租赁人得照上开价格在十天内有优先承购之权，要本校在限期内决定承购与否，否则一经转售他人，租户应予一月内迁让房屋。这对立信学校来说，真如平地风波，晴天霹雳，学校迁让既无去处，停办又不可能，要买需十万元现款，远非当时能力所及，潘序伦先生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后想到立信在重庆训练了不少会计人员，为各地因战争迁川的工商业服务，而“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成员，大多数是立信会计师业务委托人，因此邀请几位工商界的巨子，请求他们协助，他们一致表示，立信殚精竭力为他们培养人才，他们理应为立信解决这一困难。当由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倡议，号召各纱厂和银行认捐十万元，学校才能在限期内买下这批校产。由于潘仰山这次大力支助，由潘序伦提请校董会聘任他为董事。

专校迁川后校址在北碚，离重庆八十公里。潘序伦先生深感重庆市区职业青年缺乏业余深造的机会，以适应工商企业对高级会计人员的需要，就想在重庆市中心区设立专校市区班，供当地职业青年晚间进修之需。但市区房屋大部分被日寇炸毁，租屋设校毫无可能。因此，只得计划在市中心自建大楼。于是在1943年动员立信各单位全体同人、同学筹募资金数万元，先在市中心区小梁子洽购基地一块，然后委托建筑师设计图样，找营造厂投标承造，投标结果，最低造价

为“法币”四十余万元，只要签订合同，即可动工兴建。但潘序伦先生估计在半年内向当地工商业募捐，加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收入和私人积蓄存款，集腋成裘，凑集造价半数尚有可能，要按规定日期付清四十万元，实无力量，故不敢在合同上签字。筹思再三，潘序伦先生决定与北碚相邻的大明纱厂经理查济民商量，要求他做保证人，如果立信一时筹不足造价款，请他为学校垫付二十万元。大明纱厂是立信事务所的常年顾问客户，那时查济民还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经常来立信事务所商讨厂务和当地有关问题，他在潘序伦先生不辞辛苦建校筹款的精神感动之下，毅然答应作保，于是签署了合同，建成了市区立信大楼。事后，立信同人、同学，群策群力，募集了建筑基金四十余万元，并未向大明纱厂借款。由于查济民的援助，专校聘请他为校董。

此后专校又在北碚校址附近陆续购进了一所大楼和几所小洋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专校及立信同人复员回沪时，就在北碚和重庆各设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另行组织以当地实业界钜子卢作孚为董事长的校董会，两校的董事和校长都由当地人士担任，潘序伦先生担任常务董事名义。

专校早在1940年6月，以基金九万四千余元，在上海徐虹路购进基地三十三亩，准备建筑校舍之用。这块基地的所有人，原把基地的一半租给法租界一个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作为战时临时掩埋租界内无主尸骨之用，租约规定待上海战事结束，该堂即把无主棺木迁去，交还基地原主。专校复员回沪后，立信同人、同学合力向上海工商界募款。当时纺织界实力雄厚，慨捐巨款，因而在无棺木的一半基地上先建造校

舍，将建造的一座大楼命名为纺织楼。由于纺织界中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捐款最多，复将纺织楼的一所礼堂以他父亲的名字题名为宗敬堂，并聘请他担任校董。校舍先后落成，专校师生陆续移居新校舍。但面对着另一半基地三千多个荒冢，冢外尸骨狼藉，使专校师生寝食不安。曾向同仁辅元堂交涉归还空地，以便建造运动场，该堂百般推诿，不肯践约。该堂估计迁移三千多具棺木，必须在他处买进相当大的空地需款数万元，而迁移费用也要近万元之谱，因此该堂始终以所费太大，不胜负担为辞，借口推托。潘序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搬出董事长陈其采和副董事长王云五向该堂一再交涉，才由该堂按约迁让。搬运经月，出清地面归还校方，修建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运动场。

此外，1947年潘序伦先生捐美汇一万元，加上基金积余款为专校建造了一所体育馆，立信校友会也为母校募款建成大饭厅一座，题名“思源堂”。

上海解放后，潘序伦先生还把自己译著会计书籍的大量版税收入，捐给立信补校，加上同学捐款和校董会拨款，买进金陵东路和淡水路两座中型校舍，供补校发展之用。原先潘序伦先生抗战胜利后，把租地造屋的长乐路住宅捐给专科办市区班夜校之用。该住宅解放后土地租期将满，房屋按原订契约，将归地区所有。校董会合力筹款买下这块地基，取得了校舍的所有权。

以上是校董会发展和筹建、扩建校舍的情况。

（十）解放初期的立信会计学校

立信会计学校是私立学校，立信各地各种学制的学校，

解放后在私立学校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转向公立，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私立学校改为公办或结束等两个问题。

立信学校在旧社会是“专重业务，不问政治”的，这也是它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得以存在的条件之一。解放后，党组织教职员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教学改革，参加思想改造，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投考军大、革大等直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许多运动，使师生的思想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与指导学生去各工厂企业参观实习的条件更好了，组织学生担任暑期服务，下厂宣传，搞民校等工作开展了，对学生树立群众观点，起着很大作用。

教职员成立了工会，学生中建立了团委、学生会，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政治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充分体现了党正确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旧社会剥夺了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少数学到一些文化的，又因学费高昂，无法深造。立信会计学校虽有减免费的规定，但无一定比例。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规定减免费占学费收入20%，使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这是把学校改造成面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立信高职校曾为此组织了减免费审查委员会，由教职员和学生联合组成。在组织“申请学生”相互调查家庭情况，签注意见后，交减免费审查委员会结合学校预算，作最后决定。这样，就改变了过去由学校负责人决定的主观做法，贯彻了群众路线。

1950年夏，立信专校鉴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而财经干部需要尤为迫切，经呈准华东教育部，增设一年制高级会计训练班，以应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需要。1951年10月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委托立信专校代办财经干部训练班，训练财经干部，参加上海建设工作。

解放后专校和高职校的毕业生，全部由政府分配工作，消除了解放前一些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悲惨遭遇。

但私立学校学费都比较高，劳动人民入学有困难，少数减免费也解决不了大量劳动人民子女入学要求，学校在经过上述改造后，改为公立的条件已趋成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于1953年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由上海市税务局和市教育局双重领导。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在解放初期适应需要大量扩充后，于1953年，试办初中班，减少会计班，以后逐步改组为几所初级中学。函授学校于1955年停办。重庆，北碚两校移交重庆市教育局，改组为其它学校。广州立信学校，则自行停办结束。

（此文原载《财务与会计》1980年1—3期）

三、潘序伦先生的专著、 译著、论文目录

(一) 专 著

1. 中美贸易论(博士论文原名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1924年)
2. 公司财政(英文版1925年商务)
3. 簿记与会计(英文版1925年商务)
4.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1930.8.商务/立信)
5.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习题详解(商务/立信)
6. 高级商业簿记实习题附属文件(商务/立信)
7. 各业会计制度(1、2)(1934.8.商务/立信)
8. 会计学(1-4册)(1935.1.商务/立信)
9. 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1935.5.商务/立信)
10. 会计学(上、下册)(1935.5.)
11. 会计学习题解答(商务/立信)
12. 银行会计教科书(顾准著、潘序伦校)(1935.5.商务)
13. 政府会计(与王澹如合编)(1935.5.商务/立信)
14. 审计学教科书(与顾询合著)(1935.5.商务/立信)
15. 公司会计(1935.5.)
16. 审计学(上、下册)(与顾询合著)(1936.1.商务/立信)
17. 会计学教科书(与王澹如合著)(1936.4.商务/立信)
18. 会计学教科书习题解答(与王澹如合著)(商务/立

信)

19. 中国政府会计制度 (与顾准合著) (1939.6. 商务/立信)
20. 所得税原理及实务 (与李文杰合著) (1941.3. 立信)
21.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上、下册) (1936.8. 立信)
22. 初级成本会计 (1950.2)
23. 基本会计学 (1950.7. 立信)
24. 通用簿记教程 (上册) (与顾询、张蕙生合编)
(1951.1. 立信)
25. 通用簿记教程 (下册) (与顾询、张蕙生合编)
(1951.3. 立信)
26. 高级商业簿记教程 (1951.6. 立信)
27. 会计学教程 (1—2册) (1952.1. 立信)
28. 劳氏成本会计习题解答 (立信)
29. 劳氏成本会计习题应用簿册 (立信)
30.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习题详解 (立信)

(二) 译 著

1. 劳氏成本会计 (1930. 商务/立信)
2. 成本会计教科书 (1934.9. 商务/立信)
3. 会计名词汇译 (中英文对照1935年商务/立信)
4. 成本会计 (1935.5.)
5. 裴氏高等会计学——收益之决定 (1949.8. 立信)
6. 公司会计准则绪论 (1949.8. 立信)
7. 会计师查核决算表之原理与程序 (1949.9. 立信)
8. 裴氏高等会计学——合并决算表 (1949.9. 立信)

9. 裴氏高等会计学——决算表之分析及解释(1949.10.立信)
10. 裴氏高等会计学——存货之管理及计价(与萧克木合译)(1949.10.立信)
11. 裴氏高等会计学——决算表之编制(与张蕙生合译)(1949.11.立信)
12. 裴氏高等会计学——无形资产(1949.12.立信)
13. 成本与生产量及生产能量之关系及其计算方法(1949.12.)
14. 劳氏成本会计习题(与萧克木合译)(1950.1.立信)
15. 会计准则(1950.立信)
16. 苏联会计述要(与徐可南合译)(1952.立信)
17. 国营企业会计概要(1952.立信)

(三) 论文及其他

1. 营业税的征收和资本额的计算(1931.7.《会计季刊》创刊号)
2. 从职业补习教育谈到立信会计补习学校(1931.10.)
3. 生活日报社股份两合公司章程(1932.3.《生活》第7卷第12期)
4. 会计学发达史(1933.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
5. 中国之会计师职业(1933.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
6. 《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弁言(1933.7.《立信

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

7. 查帐标准程序之拟订 (1933.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

8. 工厂材料之管理与会计 (1933.10.《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2期)

9. 我国公司会计中股本帐户之研究 (1933.10.《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2期)

10. 存货估价问题 (1934.1.《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3期)

11. 清算会计 (1934.4.《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4期)

12. 学校成本会计述要——在浙江省教育厅附属机关会计人员讲习所的演讲 (1934.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7期)

13. 会计名辞之研究——在复旦大学会计系学会上的讲话 (1934.7.《会计期刊》创刊号)

14. 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 (1934.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5期)

15. 合并决算表之编制法 (1934.7.《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5期)

16. 《会计学》叙言 (1934.10.《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6期)

17. 审核应收帐款之原则及方法 (1935.4.《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8期)

18. 我国公司会计中几项法律问题 (1935.9.《会计杂志》第6卷第4期)

19. 我国合伙会计中几项法律问题 (1935.11.《会计杂志》

志》第6卷第5期)

20. 和解及破产会计概要 (1936.1.《会计杂志》第7卷第2期)

21. 单位成本之意义及其重要 (1936.6.《会计学报》第1卷第1期)

22. 会计学报序 (1936.6.《会计学报》第1卷第1期)

23. 清算及和解破产会计原理之研究 (1936.7.《会计杂志》第1卷第8期)

24. 签订销货或购货合同时是否记帐 (1935.9.《立信月报》第2期)

25. 对于我国新颁所得税法之意见 (1936.11.《立信月报》第4期)

26. 本所附设会计补习学校改办日校缘起) 1936.《立信月报》第6期)

27. 非常时期之会计问题 (1936.12.《会计学报》第1卷第2期)

28. 上海市商会所得税研究会议决案之总检讨——上海市商会所得税实际问题研究会上的演讲 (1937.1.《立信月报》第7期)

29. 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函——陈述对于第一类营业事业所得税征收须知草案应行改正各意见 (1937.1.《会计学报》第1卷第3期)

30. 致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函——对于征收须知草案续陈应行补充改正各点 (1937.2.《立信月报》第7期)

31. 所得税与工商管理之关系——在无锡及宜兴县商会的演讲 (1937.2.《立信月报》第8期)

32. 为我国所得税几个重要问题作答——在实业部的演讲 (1937.3.《立信月报》第6期)

33. 论“战争损失”之处理办法并答奚玉书会计师 (1939.5.《立信月报》第2卷第4期)

34. 本所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缘起 (1937.5.《立信月报》第10期)

35. 告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全体同志书 (1937.5.《立信月报》第10期)

36. 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照与前瞻 (1939.1.上海《申报》)

37. 会计名词之讨论 (与顾准合撰) (1939.12.《公信会计月刊》第2卷第6期)

38. 我国会计学术之追溯 (1939.12.《日用经济》第1卷第10期)

39. 本届决算后各企业应予考虑之增资问题 (1940.1.《立信月报》第3卷第1期)

40. 一年来会计事业与会计学术之回顾 (1940.1.《公信会计月刊》第3卷第1期)

41. 过份所得税率问题——与《新闻报》记者谈话 (1940.2.《立信月报》第3卷第3期)

42. 各企业亟应考虑之增资问题 (1940.2.《立信月报》第3卷第2期)

43. 股份有限公司盈余转作股本问题之研究 (1940.2.《立信月报》第3卷第2期)

44. 我国会计学校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 (1940.7.《立信月报》第2卷第9期)

45. 敬告国内有志于会计职业之青年 (1940.7.《立信月报》第3卷第7期)
46. 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简史 (1940.8.《立信月报》第3卷第8期)
47. 为自习会计敬告职业界失学青年 (1940.8.《立信月报》第3卷第8期)
48. 华南工商界对于会计应有的认识——在香港青年会商科职业学校演讲 (1940.9.《立信月报》第3卷第11期)
49. 华南工商界改良会计问题——在香港广播电台演讲 (1940.9.《立信月报》第3卷第12期)
50. 华南商业急速改进的一个征象 (1940.10.香港《商报》,《立信月报》第3卷第10期转载)
51. 我国新兴的会计职业——在重庆大学商学院演讲 (1940.10.重庆《立信会计月报》创刊号)
52. 政府会计之组织及其种类 (与顾准合撰)(1940.12.《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0期)
53. 重庆《立信会计月报》发刊词 (1941.1.重庆《立信会计月报》第1卷第1期)
54. 股份有限公司之决算及盈余分配 (何怡祥记录整理) (1941.3.《立信月报》第4卷第3期)
55. 会计学修习法 (何怡祥记录整理) (1941.3.《立信月报》第4卷第3期)
56. 政策决算的利弊 (徐杰伦记录整理) (1941.5.《立信会计月报》第5期)
57. 股份有限公司增减资本问题 (1941.9.《立信会计月报》第3期)

58. 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帐程序述要 (1941.12.《立信月报》第4卷第12期)

59. 股份有限公司股利及分红之分配 (1941.12.《立信会计年报》第4期)

60. 论连环帐谱 (1942)

61. 工商业提存特别准备问题及其解决之经过 (1942.4.《立信会计年报》第2卷第1期)

62. 大学商学院及农法学院《会计学》教材纲要草案 (1942.4.《立信会计月报》第6期)

63. 币值变动声中几个困难的会计问题 (1942.9.《立信会计月报》第2卷第3期)

64. 营利事业投资于其他营利事业所获利润之纳税方法 (1942.11.《立信会计月报》第2卷第4期)

65. 吾国之会计师职业 (1943.2.《立信会计月报》第2卷第5期)

66. 我国会计学术与教育之回顾与前瞻 (1943.2.《立信会计月报》第2卷第5期)

67. 我国工商会计应有改革 (1947.10.《立信月刊》第6卷第10期)

68. 会计学之新趋势 (张戟记录整理) (1948.1.《立信月报》第7卷第1期)

69. 改革币制后公私会计处理问题 (1948.9.《现代会计》第12期)

70. 改革币制后会计顾问问题解答 (1948.10.《现代会计》第13期)

71. 存货计价论 (1949.9.《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6期)

72. “基圆”会计 (1949.6.《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6期)
73. 书寄王云五(1979.8.《香港大公报》)
74. 会计基本方程式和资产负债资本的意义 (1949.12.《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7期)
75. 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 (1980.12.《文汇报》)
76. 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 (1981.4.《光明日报》)
77. 关于当前会计工作的四点建设性意见——在上海市会计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讲话(1982.3.《上海会计》该年第6期)
78. 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与《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 (1982.5.该报第84期)
79. 立信会计在天津(1982.10.24.《天津日报》)
80. 加强农业会计研究, 做好农业会计工作(1983.1《农业会计研究》创刊号)
81. 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 (1983.1.《青年一代》该年第1期)
82. 谈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理(与丁苏民合撰)(1983.3.《财务与会计》该年第4期)
83. 求学经过的自述 (1983.9.《商业会计》该年第9期)
84. 创业散记 (1983.11.《人物》该年第11期)
85. 紧跟形势要求, 提高财会人员素质 (1984.1.)
86. 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们会计应该怎么办——上海市会计学会第五次年会上的讲话 (1984.3.)
87. 认真贯彻《会计法》, 开创会计工作新局面(1985.4.《立信会计选辑》第3辑)
88. 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的回忆 (1984.5.《新编立信

会计丛书 立信财经丛书目录》)

89. 立信会计在重庆(《重庆财会》1984年第六期)

90. 搞活经济和会计立法(1985.4.24.《解放日报》)

91. 祝贺与希望(《安徽财会》1985年第八期)

(摘自立信校友通讯第3期1985.11.)